

第二章 冷戰後中共與日本的彼此認知

本論文的討論主題在於「認知」對「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影響，因此本章將首先對於中共與日本之間的相互認知作一整理，以找出兩方面認知上的特點和歧異之處。雖然本論文的研究範圍限縮在冷戰結束之後，但根據 Jervis 的認知理論，一個人從國際關係史的關鍵事件中所學到的教訓決定了他如何解讀當前的資訊，也就是把過去和現在進行歷史類比，¹而在「中」日關係上，這個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中日全面戰爭結束至今不過六十年，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切割過去和現在是不可能的，因此，為了進一步理解雙方相互認知的發展並進行比較，本章仍會概要介紹冷戰時期中共與日本的相互認知。

第一節 冷戰時期中共與日本的彼此認知

壹、「中」日邦交正常化前

1949 年中共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則是退居台灣，形成隔海對峙的局面。由於中共採行社會主義體制，與戰後日本採行的西方式民主體制大相逕庭，加上日本後來選擇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媾和，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以及選擇中華民國為和約談判對象，因此使得此時期的「中」日關係停滯不前。中共對日本政府的選擇與行為大表不滿，指斥其與美帝國主義勾結，並圖謀軍國主義再起，這不僅出自於對美國遠東圍堵線的不安，也表現出中共對日本在道德上的不信任，為了改變日本的軍國主義性質，中共採取積極拉攏贊同中共主張的日本人士以逼迫日本政府讓步的統一戰線策略。日本一方面出於現實面的考量而試圖與中共改善實質關係，但另一方面又因美國、台灣的牽制和對共產主義的防範心態而不願進一步觸及建交問題，直到大環境的變化促使日本必須正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問題為止。基本上，中共

¹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17.

對日本的認知較為一致，而日本對中共的認知則較分歧，這也對「中」日關係的發展造成了阻礙。

一、中共對日本的認知

中共向來對日本軍國主義抱持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因此主張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以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及其成因，²以及迅速嚴厲地處罰一切戰犯以建立和平與安全的鞏固基礎。³然而隨著美國改變對日政策，日本保守勢力重新掌政，許多戰犯和遭解除公職的人物也重返政壇，故中共在建政之時所面臨的日本是一個「正在被美帝國主義的佔領者製造成為反對民主、反對社會主義和策劃新戰爭的反動堡壘」，⁴日本再次成為了中國大陸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中共與蘇聯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主要目的就在於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再起；⁵在未能出席對日和會、參與和約制訂的情況下，中共指責舊金山對日和約以及美日雙邊安全條約「業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以及其他許多亞洲國家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⁶在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和約之後，中共更宣稱日本「毫無悔過之心」、「準備重新進犯大陸，復活他對中國和亞洲人民的帝國主義統治」，而「吉田蔣介石“和約”」是「公開侮辱並敵視中國人民」的。⁷

中共自認已繼承了中國代表權，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理應有權參與戰後日本的處置工作，然而身為戰敗國的日本竟與美國聯手排擠中共，並與台灣建

²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頁1086。

³ 「嚴懲戰爭罪犯（1945.9.14）」，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20~22。

⁴ 「《人民日報》社論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1950.1.17）」，同前註，頁70。

⁵ 條約前文與第一條皆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防衛對象。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 第一集（1949-1951）（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頁1。

⁶ 「周恩來外長關於美國及其僕從國家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的聲明（1951.9.18）」，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頁103。

⁷ 「周恩來外長關於美國宣布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生效的聲明（1952.5.5）」，同前註，頁124。

立外交關係，這不但違背中共對日本的期待，更無視其「合法權利」，日台建交更是敵視中共、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中共對此當然無法接受。舊金山和約由於是多邊條約，加上海峽兩岸均未與會，中日間的問題仍須靠雙邊和約進一步解決，因此雖然中共從未承認其合法性，但並未將其當成「中」日之間的障礙。⁸真正令中共在意的，就是美日安保以及日華（中華民國）和約的存在，因為這攸關中共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大致來看，對中共而言，日本所形成的安全威脅主要有：

1. 防衛問題—中共認為美日安保使日本仍處於美國的半佔領狀態下，這時建立的日本武裝必然成為美國的侵略工具，⁹因此中共對於日本擴張其防衛預算、武器質量以及防衛範圍等作為總是持負面看法。中共還批評日本所謂「早期排除侵略」和「對付間接侵略」只是向外侵略的藉口，其宣稱在法理上可擁有自衛用核武器的說法也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急於取得核武器的慾望。¹⁰另外，以中共為假想敵之一的「昭和三十八年統合防衛図上研究」（三矢研究）更讓中共覺得日本想藉機擴充軍備、規劃動員體制及修改憲法。¹¹

2. 台灣問題—中共一貫堅持台灣為其領土之一部份，國民政府已「為中國人民所唾棄」，¹²因此只要日本表示要加強日台關係，中共就會指責其敵視「中國」人民、討好美國，企圖復活軍國主義；¹³面對日本維護台灣在聯合國的席次和主張台灣地區的和平安全對日本安全至為重要的態度，中共認為日本有意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企圖恢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並以台灣為

⁸ 「周恩來總理答覆日本新聞界廣播界代表團五項問題（1955.8.17）」，同前註，頁 215。

⁹ 「《人民日報》社論 日本人民面臨著兩條道路（1955.2.26）」，同前註，頁 191。

¹⁰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鐵證—評佐藤政府的所謂“防衛白皮書”（1970.11.1）」，同前註，頁 930~931。

¹¹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野心不死（1965.2.19）」，同前註，頁 780~781。

¹² 「《人民日報》社論 論日本和中國恢復正常關係（1954.12.30）」，同前註，頁 185。

¹³ 「《人民日報》社論 互相團結 互相支持 共同鬥爭（1960.5.16）」，同前註，頁 490。

跳板，向東南亞擴張，重建「大東亞共榮圈」。¹⁴對中共而言，台灣問題不僅涉及安全和領土問題，更攸關國家主權完整與否以及中共是否能站穩力抗帝國主義的立場，因此中共在這問題上格外強硬，完全以台灣問題的解決作為關係正常化的前提。¹⁵

3.領土領海問題—台灣問題可說是領土問題的濫觴，但是進一步觸及中共敏感神經的首先是 1958 年日本漁船闖入中共禁漁區事件。中共認為這是受到海上保安廳指使的，意圖以捕魚為掩護，暗中進行兵力配置和地質水文調查等軍事偵察活動，是藉「反共」之名復活軍國主義的表現。¹⁶1970 年日本宣布尖閣諸島（釣魚台群島）將隨琉球群島一同歸還日本，同時有意開採當地海洋資源，中共則是將釣魚台群島視為台灣附屬島嶼而申明其主權，並反對日本將其收為領土及納入防衛範圍。¹⁷

可以看出，對中共而言，日本接受美日安保體制、配合美國採取親台政策不僅暴露出美帝國主義在遠東的陰謀，更顯示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不死，這對中共的國家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脅。在中共的認知中，日本的對華政策並不全只是被動地追隨美國，而是有其主動性，並且是和戰前的反共侵略政策相互聯繫的，即日本因反共而反中共政權，因反中共政權和對華野心不死而勾結美國與台灣遂行反中共政策。在「中」日建交前，中共對日本的批評經常可以見到歷史名詞的出現，例如「九·一八」¹⁸、「大東亞共榮圈」等，過去在對華侵略

¹⁴ 「《人民日報》觀察家文章 佐藤榮作的白日夢（1964.11.25）」，同前註。

¹⁵ 1971 年 10 月，中共提出「復交三原則」，內容為：（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且已經歸還中國；（三）「日台條約」是非法無效的，必須廢除。中共原本還提出第四原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的一切合法權利並驅逐台灣代表，但此問題已先於 1971 年第 26 屆聯合國大會上獲得解決。見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 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57。

¹⁶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岸信介政府為什麼對中國海防這樣感興趣？（1958.11.1）」，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頁 416-417。

¹⁷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決不容許美日反動派掠奪我國海底資源（1970.12.29）」，同前註，頁 936。

¹⁸ 「《人民日報》社論 不許新的“九·一八”事變在亞洲重演！（1961.9.18）」，同前註，頁 590-593。

上擔任要角的人，如田中義一、東條英機等也經常被拿來與當時的日本政府相提並論，¹⁹可見過去日本侵華的歷史經驗對中共認知的影響相當強烈。根據 Jervis 的說法，有四個變量可以決定一個事件對日後的認知傾向產生多大影響，分別是：是否為親身經歷、是否為在成年生活或事業生涯早期的經歷、是否為對自己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自己是否熟悉許多國際事件，因而能多方位認識問題。²⁰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而言，日本侵華此一事件可說是完全符合以上四個變量，他們不但親身經歷，更實際領導了中共的抗日鬥爭，這導致他們日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動向極為敏感。從歷年來的領導人發言或報刊評論文章可以看出，他們對日本政府的動向掌握不可不謂清楚，但其主要的認知歸根到底就是：日本政府親美親台就是「反華」，就是軍國主義復活。另外，這時期的中共大量使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等詞形容美日政府，反映出中共建政初期充滿反帝色彩、仇視西方陣營的世界觀。

中共所期盼的日本，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國家」，而不是「再度成為威脅亞洲與世界和平安全的侵略國家」，²¹也就是說，一個不配合美國，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日本是中共所樂見的，因此爭取認同中共立場、反對日本政府親美親台政策的日本人士以組成統一戰線就形成了中共對日政策的另一面。中共建政之初即公開表示「日本帝國主義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然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但是日本人民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支持者美國帝國主義」。²²在吉田茂下台後，中共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畫》，表示將爭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間接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日本獨立、和平和民主的運動，以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的

¹⁹ 「《人民日報》觀察家文章 日本軍國主義面目的大暴露（1958.10.17）」，同前註，頁413。

²⁰ Jervis, op. cit., p. 239.

²¹ 「周恩來外長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1951.8.15）」，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頁99~100。

²² 「《人民日報》社論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1950.1.17）」，同前註，頁70。

關係和孤立美國，最後逐步達到外交關係的正常化。²³這就是所謂的「以民促官」，其中似乎透露出這樣的訊息：「中」日建交與其說是中共對日政策的目標，不如說是中共利用日本方面希望改善日「中」關係的心態，用以迫使日本政府接受中共主張的工具。

這一時期中共對日本的認知，雖然主要還是從國家安全的現實層面出發，但受到歷史經驗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影響，因此對日本政府始終存有「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疑慮，並且看待日本這一資本主義國家之時，習於將其「統治階級」與「被壓迫人民」分開看待，²⁴這也與 Jervis 認為許多國家的決策者往往會用本國政治體制的經驗來理解其他國家的狀況的說法符合。²⁵另外，由於中共的極權主義政體性質，因此中共在對日認知上呈現出相當高度的一致性。

二、日本對中共的認知

相較於中共對日本的認知，日本對中共的認知就顯得較為分歧，這些分歧主要體現在政治主張上，例如是否承認中共、對共產黨政權的好惡和是否願意接受中共主張而斷絕日台關係等，但是出於現實上的需要，日本各界又存在著一個共識：和中國大陸的實務性關係絕對不能中斷，實質往來一定要維持住。

日本政府對中共的認知是最為保守的，這除了美國的施壓和日華和約的拘束外，恐怕與保守派一直以來的反共心態有關。大正時代日本即有出兵西伯利亞試圖消滅俄國蘇維埃政權之舉，中日開戰前日本也試圖爭取中國一同反共，之後的日德義三國同盟亦以反共為號召，可見日本對共產黨一直就抱有疑慮。二次大戰後，東亞又出現了北韓和中共兩個共產政權，對此吉田茂即認為，日

²³ 張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41 期（1997 年 11 月），頁 6。

²⁴ 見「《人民日報》社論 日本人民鬥爭的現勢（1950.7.7）」，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頁 78~82。

²⁵ Jervis, op. cit., p. 283.

本在失去武裝的情況下面對著共產勢力的擴張，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乃成為其自保的唯一選擇。²⁶岸信介曾經重申中共是聯合國決議下的侵略國，更直指中共比蘇聯更可能以共產主義滲透日本，故日本支持台灣反攻大陸，²⁷這樣的說法已經更進一步表示中共是日本國家安全的威脅了。1964年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後，內閣官房長官鈴木善幸即表示中共賦予該次核試的軍事意義已經給日本的和平安定造成危害，但他又強調「只要日美安保條約還在，對我國就不會有任何影響或危險」，再次表明了日本藉由美日安保來防範中共的意圖，²⁸佐藤榮作在上台之際也表示，中共的核試爆使日本國民對美日安保條約的意義有了重新認識，也讓大多數日本國民體會到，美國依據美日安保協防日本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²⁹由此可見，無論戰前或戰後，日本政府對共產主義的防備之心絲毫未減，不同的只是日本在戰前採取了主動出擊的策略，而在戰後採取追隨西方陣營被動防守的策略。

相對於自民黨政府，在野勢力的認知就截然不同。他們普遍認為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關係密切，但戰後雙方關係卻因沒有邦交而處處受限，因此有必要和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加強兩國的親善友好，因此日本必須儘速與中共恢復外交關係、不承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承認台灣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台灣問題為中國內政問題、廢除日華和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要求美軍撤出台灣以及承認中共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驅逐台灣代表等。³⁰然而，即使

²⁶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平和会議における吉田茂総理大臣の受諾演説（1951.9.7）」，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平和条約の締結に関する調書 第4冊(7)**（東京：外務省，2002年），頁121。

²⁷ 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東京：原書房，1981年），頁138~139。

²⁸ 「原爆実験についての官房長官談話（1964.10.17）」，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2）**（東京：原書房，1984年），頁528。

²⁹ 「佐藤榮作内閣総理大臣のナショナルプレスクラブにおける演説」，同前註，頁547。

³⁰ 「資料 36 日本社会党訪中使節団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との共同声明（1957.4.22）」、「資料 62 日本共産党代表団と中国共産党代表団との共同声明（1959.10.20）」、「資料 142 日本公明党訪中代表団と中国日本友好協会代表団の共同声明（1971.7.2）」、「資料 152 民社党訪中代表団と中日友好協会代表団の共同声明（1972.4.13）」，霞山会編，**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 1949年-1997年**（東京：霞山会，1998年），頁114、168~169、374~375、404~405。

目標相同，出發點未必相同。社會黨、共產黨等左派政黨的意識型態與中共較為相近，因此對中共的主張多所同意。他們普遍對日本過去侵華表示譴責及內疚，社會黨甚至認為戰爭責任正是中國問題的原點，³¹因此早在 1950 年代就開始推動日「中」復交運動。社會黨當然全非從道義面來看待日「中」關係，他們也從現實面考量，認為不該讓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孤立於世界之外，以及日「中」建交有利於日本、亞洲乃至於世界的和平，³²但與公明、民社等黨相較，其現實色彩還是比較淡。公明黨之所以主張承認中共，是有鑑於承認中共的國家越來越多，聯合國接納中共只是時間問題，故應承認統治中國大陸七億人口的中共政權，³³民主社會黨更曾經主張「一中一台」，一方面譴責中共「錯誤的」戰爭肯定論和核武裝等作法，一方面讓中共參與國際場合不使其孤立，³⁴因此日後政策大轉向時還造成黨內意見的分歧。³⁵因此對於非左派的在野黨而言，與中共建交只是出自於現實的考量，而其在野的身份較不妨礙其改變路線而已。

自民黨政府的對「中」政策的確是保守許多，但在盡可能加強日「中」實質往來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這相當程度地反映出日本對「中」外交上的現實性。由於歷史地理的關係，二次大戰前日本的經濟發展和掠奪來源又以中國大陸為主，這都使得日本無法對中國大陸視而不見。戰後的日本政府一直有恢復和中國大陸關係的想法，主要動機則是為了復興日本。吉田茂從日本的國家利益出發，認為日本如要實現其輕武裝、重經濟的主張，就必須和中共發展貿易關係，然而他更認為對美協調路線是實現日本國家利益的基礎，因此當美國決

³¹ 石橋政嗣、藤山愛一郎、波多野宏一，「国交回復への主体的条件」，**中央公論**（東京），第 86 卷第 2 号（1971 年 2 月），頁 86-87、90。

³² 同前註，頁 86。

³³ 「大衆福祉をめざして一公明党の政策（1966.7.25）」，日中貿易促進議員連盟編，**日中關係資料集（一九四五～一九六六年）**（東京：日中貿易促進議員連盟，1967 年），頁 507-508。

³⁴ 「民主社会党昭和四十一年度外交政策（1965.12.4）」，同前註，頁 506-507。

³⁵ 山村徳三，「議員大連合の思惑」，**中央公論**（東京），第 86 卷第 2 号（1971 年 2 月），頁 102。

定圍堵中共時，吉田只好選擇親美路線，惟同時盡可能地在對中共關係上留有轉圜空間，例如他極力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陳述日本在離間「中」蘇關係上的重要性，在和會上不邀請任一方中國代表與會，以及希望待中國代表權問題解決後再討論中日講和等；³⁶即使和台灣締結和約，他仍堅稱該約只適用於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及未來所控制的領土，³⁷從而奠定日本的「兩個中國」政策，即政治上承認台灣，但又力圖發展和中國大陸間的經貿關係，如此日本既不會得罪美國，又可以和中國大陸維持經貿往來，更可以扮演西方與中共之間的橋樑。³⁸

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發生變化和「中」美和解之前，日本政府一直以這樣的思維處理日「中」關係。鳩山一郎內閣成立之初即表示，基於中共政權和國民政府分別實際統治中國大陸和台灣這一現實，因此有必要認定中共實為一獨立國家，但這並非表示日本承認中共政權，而且目前也還不是時候，惟日本希望在不違反國家義務的前提下發展日「中」貿易。³⁹1957年日本政府提出「外交三原則」⁴⁰，其對「中」政策也大致不出此一範圍：⁴¹

1. 聯合國中心主義—中國代表權問題只有以聯合國為中心進行充分討論，並在世界輿論的背景下找出公正的解決之策才能解決，也就是日本將視聯合國態度來決定對華政策的調整。

³⁶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初版2刷），頁64~65。

³⁷ 「第十三回国会 参議院外務委員会會議録第四十三号」，**国会會議録検索システム**，1952年6月26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013/0082/01306260082043a.html>。

³⁸ 見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台北：東大圖書，1999年），頁49~53。

³⁹ 「第二十一回国会 衆議院本會議會議録第五号」，**国会會議録検索システム**，1954年12月17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21/0512/02112170512005a.html>。

⁴⁰ 1957年日本政府發行第一本外交青書（藍皮書），揭示了日本外交的三項原則，即（一）聯合國中心主義；（二）與自由主義國家協調；（三）堅持身為亞洲一員的立場。見五百旗頭真編，**戰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2002年初版6刷），頁88。

⁴¹ 「外務省の中国問題に対する統一見解—对中国基本政策（1964.3.5）」、「自由民主党の中国問題に対する統一見解（1964.3.25）」，日中貿易促進議員連盟編，前引書，頁505、508~509參照。

2.與自由主義國家協調—配合美國，維持與台灣間的外交經濟關係；若承認中共而和台灣斷交，則將危及自由陣營的團結，因此日本認為維持現狀乃為上策。

3.堅持身為亞洲一員的立場—除了顧及自由陣營的團結之外，維持對台關係亦是著眼於亞洲的和平與安定，但基於日本和中國大陸間的歷史地理關係，日本不可能如美國一般完全斷絕和大陸的往來，因此仍有必要和大陸以「政經分離」原則發展實質性關係。

1970年前後，以上三原則的背景都產生了變化。在聯合國方面，儘管日本跟隨美國提出「重要問題案」試圖阻擋中共入會，但支持中共入會的會員國比例卻緩步上升，並在1970年首次超過支持台灣的比例，⁴²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自由陣營方面，繼1964年法國承認中共後，義大利、加拿大也於1970年承認中共，美國方面則是重開「中」美大使級會談，並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有所軟化，只求能保住台灣會籍，對於中共入會與否已不極力反對；⁴³在日「中」實質關係方面，由於中共激烈抨擊佐藤政府讓日「中」貿易陷入僵局，使得自民黨部分人士產生了不建交則無以突破僵局的想法，因此於1970年12月9日將原先的「日中貿易促進議員聯盟」改組為「日中国交回復促進議員聯盟」。⁴⁴日本政府有鑑於此，只得轉而歡迎中共加入國際社會，並表示願意與中共進行政府間接觸以緩和東亞緊張局勢和改善日「中」關係。⁴⁵1971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

⁴²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〇～一九七二）*（台北：五南圖書，1993年），頁198~199。

⁴³ 那須聖，「〔國連報告〕中国代表権の将来」，*中央公論*（東京），第86卷第1号（1971年1月），頁96。

⁴⁴ 山村德三，前引文，頁99~101。

⁴⁵ 「資料123 米中大使級会談に関する愛知外務大臣の談話（1969.12.13）」，霞山会編，前引書，頁327。

除出去」⁴⁶後，日本就改而承認中共為唯一合法政府，日「中」間的基本問題就是邦交正常化了。⁴⁷

儘管左派勢力會從歷史問題看日「中」關係，但基本上整個日本還是從現實角度來看待中共。戰後的日「中」關係始於經貿，因此日「中」貿易符合日本國家利益並無太大爭議，然而在政治、外交和安全上，日本應和中共維持何種關係以維護國家利益則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日本最初根據國際現實選擇了美國與台灣，而後又因國際環境的轉變而選擇了中共，看來可說是變動極大，但若從日本「兩個中國」政策的初衷來看，可以說日本的立場其實是不變的，那就是以現實角度看待「中」日關係，這和中共從歷史經驗看待「中」日關係的傾向有著極大的落差。

貳、「中」日邦交正常化後

日本和中共在 1972 年 9 月發表了關係正常化的共同聲明，之後則在 1978 年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這兩份文件確立了「中」日外交關係的基調——日本對戰爭加害責任的反省、戰爭狀態的結束、「一個中國」原則、中共放棄對日戰爭求償權、和平共處五原則及反霸權條款等。「中」日這時期因為有著反蘇的共同利益而在安全關係上有所改善，但歷史經驗所造成的認知差異仍然為雙邊關係帶來了負面影響。

一、中共對日本的認知

1972 年田中角榮上台後，確立與中共建交的大方向，中共對日本的認知也因而出現了轉折。中共認為，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導致其國際地位上升和美

⁴⁶ 「二七五八（二十六）·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聯合國，<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26/20/IMG/NR032620.pdf?OpenElement>。英文原文見“2758 (XXVI).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27/74/IMG/NR032774.pdf?OpenElement>。

⁴⁷ 「資料 155 田中總理が日中国交正常化を急ぐと言明したことに關する邦字紙記事（關連部分）（1972.7.5）」，霞山會編，前引書，頁 409。

蘇反「華」政策的破產，受到美蘇雙重壓力的日本為了追求獨立空間，就必須改變敵視中共的政策和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以追求大國地位和反制美蘇。⁴⁸ 在田中政府願意尊重「復交三原則」的前提下，中共大開建交談判之門，其著眼點主要是：1.有利於反對蘇美、特別是蘇聯霸權的鬥爭；2.有利於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3.有利於解放台灣的鬥爭；4.有利於緩和亞洲緊張局勢。⁴⁹ 也就是說，爭取對日和解不僅有助於中共的反霸（蘇聯）全球戰略，更可獲得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讓步，及改善周邊國家對中共在文革中大搞「革命外交」的疑慮。在這一思維下，日本成了中共反蘇戰線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中共也開始以較正面的態度去看待日本：

1.防衛問題—過去中共視美日安保為美日帝國主義勾結下的產物，並對意圖提升自衛隊戰力的日本政府有所提防，但此時中共則強調「中」日建交並非針對美國，因此美日安保持續亦無妨，而日本的防衛力程度是日本內政，中共不予干涉。⁵⁰ 另外，為了拉攏日本加入反蘇陣營中，中共除了強調自己在財政上無力負擔先進武器，以及無意成為軍事大國之外，還表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早已名存實亡，要日本放心。⁵¹ 但在安撫日本的同時，中共也要求日本必須按照「中」日共同聲明接受其「反霸權」的立場，並稱如此可表現出「中」日雙方不稱霸的決心，並改變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印象。⁵² 和約簽訂後，中共則稱此約是雙邊關係的政治總結和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新起點，其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也有著重要意義。⁵³

2.台灣問題—中共一向認為日台外交關係和日台條約是阻撓「中」日建交

⁴⁸ 羅平漢，**中國對日政策與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年中國對日政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年），頁235。

⁴⁹ 同前註，頁235~236。

⁵⁰ 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曉光編，**記錄と考証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條約締結交渉**（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頁57~60。

⁵¹ 同前註，頁62~64。

⁵² 同前註，頁165~166。

⁵³ 「裕仁天皇和皇后會見鄧小平副總理和夫人（1978.10.23）」，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241。

的障礙，因此要談建交就必須解決這兩個問題。在「中」日共同聲明中，中共雖未直接處理日台條約，⁵⁴但仍使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和「充分理解和尊重」其「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立場，以及承諾「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⁵⁵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開羅宣言提及「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中共因而據此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已經歸還中國的事實，就進一步得到確認」。⁵⁶此後，「中」日共同聲明便成了中共用以限制日台關係的依據，只要雙方的交流層次超過一定限度，中共方面就會以「中」日共同聲明來批評日本。⁵⁷

3.領土領海問題—1974年1月，日本與南韓簽訂了關於共同開發東海大陸棚（架）的協議。協議於1977年6月生效，兩國並於1980年5月進行石油鑽探試採。中共以「大陸架是大陸自然延伸」的原則提出了抗議，認為涉及其他國家的部分應由中共和相關國家協商劃分，而非以日本方面所稱的「日中中間線」來劃分。⁵⁸另外，自從1972年5月美國將釣魚台群島移交給日本之後，該地的主權歸屬便成了「中」日間的爭議問題之一，並在1978年引發了中共保釣漁船和日本右翼船隻先後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的事件，而1981年7月日本沖繩縣派遣船隻進入釣魚台海域進行漁場資源調查亦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抗議。⁵⁹然而在整體上，中共僅僅在日本採取進一步行動時重申其立場而已，不但未採取具體報復措施，甚至有意擱置不理，在不涉及領土主權問題的前提

⁵⁴ 例如未具體指出戰爭狀態何時、如何結束，並以「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取代「戰爭狀態」，中共放棄「賠償請求」而非「賠償請求『權』」，以及未明文要求日本廢除日台條約等。

⁵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共同聲明（1972.9.29）」，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頁111。

⁵⁶ 「《人民日報》社論 中日關係史的新篇章（1972.9.30）」，同前註，頁116。

⁵⁷ 例如1994年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和2001年前總統李登輝訪日時，中共都呼籲日本必須恪遵中日共同聲明。

⁵⁸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我國大陸架主權不容侵犯（1977.6.14）」，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頁213~214。

⁵⁹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就日方對中國釣魚島進行漁場資源調查事發表談話（1981.7.22）」，同前註，頁328~329。

下進行共同開發。⁶⁰

表 2-1 「中」日間政府首腦互訪（1972-1989）

出訪時間	出訪人士	備註
1972.9.25	田中角榮（首相）	簽訂「中」日共同聲明，兩國建交
1978.10.22	鄧小平（副總理）	代表中共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儀式
1979.2.6	鄧小平（副總理）	
1979.12.5	大平正芳（首相）	簽訂文化交流協定、渤海灣油氣開發協議； 日本首度提供 ODA 借款；邀請華國鋒回訪
1980.5.27	華國鋒（總理）	首位訪日的中共政府首腦，也確立了首腦互訪的慣例
1980.7.8	華國鋒（總理）	參加前首相大平正芳葬禮
1982.5.31	趙紫陽（總理）	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三原則
1982.8.26	鈴木善幸（總理）	
1983.11.23	胡耀邦（中共總書記）	將「三原則」加入「相互依賴」擴大為「四原則」； 成立「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
1984.3.23	中曾根康弘（首相）	宣布第二次對「中」借款
1986.11.8	中曾根康弘（首相）	首位在任內二度訪「中」的日本首相
1988.8.25	竹下登（首相）	宣布將提供 8,100 億日圓借款予中共
1989.4.12	李鵬（總理）	對竹下登訪「中」的回訪

資料來源：整理自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 1945-1995**，頁 280、335、351~357。

在「中」日共同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後，中共對日本的認知大致是正面的，因此也較願意讓步，而雙邊關係也隨著高層互訪的頻繁（見表 2-1）和政府間會談的常規化而進一步加溫，並形成了所謂「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互相信賴」的「中」日關係四原則。⁶¹然而，長期影響中共對日認知的歷史因素卻於 1980 年代再次起了負面作用。「教科書事件」及中曾根康弘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事件對中共而言都反映出日本有意竄改過去侵略史實的意圖。中共認為，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為已經世界各國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聯合國憲章中確認，而日本也已在「中」日共同聲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表達

⁶⁰ 「鄧小平副總理會見鈴木善幸眾議員時談中國借鑑日本現代化經驗和在釣魚島搞共同開發不涉及主權問題（1979.5.31）」，同前註，頁 267。

⁶¹ 「中日兩國政府同意把中日關係三原則擴大為四原則並決定建立“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1983.11.25）」，同前註，頁 444。

了反省立場，因此日本意圖竄改史實的作法絕對不只是日本的內政問題，而是攸關「中」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亞洲及世界的和平；⁶²而日本在「深刻認識過去曾給以亞洲國家為中心的人們帶來重大的痛苦和損害」的同時卻又宣稱「（參拜）目的在於追悼為保衛祖國和同胞獻出了寶貴生命的陣亡者」，不但模糊了日本侵略戰爭的本質，也傷害了中國大陸及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⁶³然而中共在批判這些事件時，已不若過去一般將整個日本政府視為「反動派」，僅將火力限縮在發表不當言論者身上，而對「日本人民」也僅強調「中」日之間共同利益，而不提諸如「反帝統一戰線」之類的呼籲。

整體來看，建交後中共的對日認知及態度比起建交前的確變得正面許多，然而從中共依舊對日本的歷史立場有所質疑來看，吾人可以發現歷史問題仍是中共用來評估日本是否會對中國大陸造成威脅的主要依據。只要日本繼續有人主張與中共相左的歷史觀，中共就會呼籲「警惕軍國主義的邏輯」，「對一切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逆流加以毫不含糊的痛擊！」。⁶⁴

二、日本對中共的認知

田中角榮上台後即以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為首要目標，這是因為他認為如何處理日「中」問題對日本而言一向是個難以解決的國內問題，若這問題得以解決，則將可大大減少國內意見紛亂的狀況；另外，日「中」雙方的人口數佔世界四分之一，要是不解決日「中」問題，則日本就無安定可言；進一步來說，朝鮮半島的三十八度線和柏林圍牆、古巴並列為全球三大接點，若不設法阻止這些接點發生衝突，則日本也將失去和平，因此日本不僅需要美日安保條約，也需要和中共締結友好關係，如此美日「中」三國所構築成的等腰三角形才能維護遠東和平。⁶⁵日本欲與中共建交的原因當然不止這些，但從這裡可

⁶² 「《人民日報》社論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1982.8.15）」，同前註，頁 365~367。

⁶³ 「新華社評論 侵略戰爭的性質不容模糊（1985.8.21）」，田桓主編，同前註，頁 550。

⁶⁴ 「《解放軍報》評論員文章 警惕軍國主義的邏輯（1982.8.3）」，同前註，頁 357~358。

⁶⁵ 田中明彥，**日中關係 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初版2刷），頁 75~76。

以看出，國家安全也是日本所納入考量的，因此日本政府即曾表示對「中」建交的目的有二：第一是隨著建交結束雙方之間的不自然關係，以強化日本的和平外交；第二是為了透過建交對亞洲及世界的和平安定有所貢獻，而日「中」邦交正常化並不針對第三者。⁶⁶這兩個目的，在之後的共同聲明及和平友好條約中得到解決，而日本也經由這兩份文件確立了對「中」關係的基本認識：⁶⁷

1.友好・協調關係和促進和平的確認與意義—共同聲明的「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係，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也是對緩和亞洲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貢獻」及和平友好條約的「希望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定作出貢獻；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決定締結和平友好條約」都體現出日「中」睦鄰友好的雙邊意義和世界意義。

2.歷史問題的認識—日本在共同聲明中表明「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顧及中共立場。儘管歷史問題不斷出現，但日本政府基本上是站穩這一立場的。

3.台海兩岸關係—日本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理解並尊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中共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4.關於經濟合作的基本立場—日本在共同聲明中同意「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關係和擴大人員往來，……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1979年首相大平正芳訪「中」時表示，將應中共所求積極協助中共進行經濟建設。

日本政府有意促成日「中」關係的改善，這對日本民眾的對「中」認知產生了正面影響。天兒慧認為，日本人對中國大陸的認識是在對中國歷史文化的

⁶⁶ 古川万太郎，前引書，頁376。

⁶⁷ 天兒慧，*等身大の中国*（東京：勁草書房，2003年），頁197~200。

憧憬、對過去侵華戰爭的罪惡感和責任感、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不信任和敵對感，以及身為已開發國家，對中共這一開發中國家寄予同情、援助的感情下所交織出來的。⁶⁸關於這一時期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大陸，據 1988 年讀賣新聞所做的民調顯示，「文化、藝術、歷史」是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最想瞭解的項目（61.0%），在「多數日本人是否對過去的日中戰爭有所反省」問題中有 34.3% 認為沒有反省，這比中國大陸的 27.5% 還要高；認為中共是日本安全威脅的僅佔 4.9%，在「對現今日『中』關係最重要的部分」問題中，選擇「貿易及經濟合作」的有 46.4%，僅略少於「文化・人的交流」的 47.6%。⁶⁹這些數字反映出了當時日本對中國大陸正面情感的強烈和負面情感的淡薄，因此日本社會中「日中友好」的氣氛相當濃厚，甚至形成所謂「中國熱」（中国ブーム），這從總理府（現內閣府）輿論調查所顯示的，這一時期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有親近感的和認為日「中」關係良好的皆在 75% 左右更可看出。⁷⁰

然而，和中共相同的是，強調「日中友好」不代表日本對中共全然安心，合作也不代表日本就完全放棄自己的立場。事實上，日本對「中」認知的現實面依舊存在，這從日本為了達成其對「中」建交的目的，在談判過程中與中共針鋒相對即可看出。

結束日「中」間的不自然關係是雙方的共識，但解決方式則因為日華和約的存在而複雜化。1952 年的日華條約規定，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戰爭狀態自條約生效之日起結束，日本並依約放棄對台灣、澎湖群島及南沙、西沙群島的所有權利、權限及請求權，而中華民國則是自動放棄對日索償權利，並同意本約施行範圍為目前或日後受中華民國政府支配的所有區域。⁷¹在建交談判中，日

⁶⁸ 天兒慧，「日中關係二十一世紀への提言—感情論と戰略論の狭間」，**中国** 21（名古屋），總第 10 期（2001 年 1 月），頁 44。

⁶⁹ 「日中共同世論調査の内容」，**読売新聞**（東京），1988 年 9 月 24 日，第 10 版。

⁷⁰ 天兒慧，「日中關係二十一世紀への提言—感情論と戰略論の狭間」，頁 43。

⁷¹ 「資料 10 日本国と中華民国との間の平和条約（1952.4.28）」，霞山会編，前引書，頁 32~38。

本始終堅持日華和約有效的立場，但又依其需要而做出有利於己的詮釋。一方面，日本認為對華戰爭狀態已在日華和約生效後結束，因此共同聲明不需明示戰爭狀態結束的時間，而是以結束事實的確認來個別陳述雙方立場，⁷²這看起來似乎表示日本認為中華民國在法理上代表全中國，如今承認中共只是政府承認的改變，日華條約的精神應被承繼下來，但另一方面，日本又認為日中之間的戰爭狀態係依據「中」日共同聲明前文及第一條而得到了「完全的解決」，⁷³彷彿過去日華和約只是「部分解決」而已；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中共立場，日本僅能在政治上根據波茨坦公告予以「充分理解和尊重」，無意對台灣抱持領土野心及協助台灣獨立運動，但在法律上則因為日本已經放棄對台灣的領土主權，無法對其歸屬進行單獨認定，故不能予以「承認」，⁷⁴這些說法又似乎將台北和北京政府視為實際上互不隸屬的兩個政權，如同過去讓日華條約在法律效力上無法同時涵蓋台海兩岸一般，日本亦力圖讓日「中」共同聲明產生類似的法律效果，從而讓日本有繼續推行其實質上「兩個中國」政策的空間。中共屢屢要求日本應從政治高度來看待雙邊問題，但顯然日本仍然企圖在政治和法律上進行切割，這導致許多問題不但未因雙方建交而解決，反而因為中共在法律面上的退讓而形成爭議至今。

面對中共宣稱不當軍事大國和「中」蘇條約名存實亡的善意，日本亦有所回應，例如日本政府無意也無法修改和平憲法，無意重回軍國主義，並凸顯自衛隊「專守防衛」的特性和在處理國際紛爭上戰力的薄弱等，然而，中共對日本的革命輸出和「中」蘇同盟始終令日本在安全上感到不安。日本認為，日「中」之間的不正常狀態正是亞洲最大的不安定要素，因此建交正代表亞洲和平的前進，具體表現便是共同聲明中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日「中」不會聯手搞大

⁷² 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曉光編，前引書，頁 111。

⁷³ 「資料 164 日中国交正常化の際の大平外務大臣及び二階堂内閣官房長官記者会見詳録（1972.9.29）」，霞山会編，前引書，頁 433。

⁷⁴ 「第七十回国会 衆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二号」，国会會議録検索システム，1972 年 11 月 2 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70/0380/07011020380002a.html>。

國主義，以及日「中」建交不會對第三國造成威脅等，⁷⁵也就是共同聲明的第六和第七條。然而，日本所重視的是互不干涉內政和不對第三國造成威脅，這與中共強調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的立場有相當差距。在「中」美和解、「中」日建交之後，中共的「反霸權」顯然是針對蘇聯，因此當中共要求在和平友好條約中列入「反霸權條款」時，日本方面總顯得格外慎重，試圖避免讓此約帶有針對蘇聯的意涵。1975年，日本外相宮澤喜一提出了所謂「四原則」，即反霸權不僅限於亞太地區，還應擴及到全球範圍、反霸權並非針對特定國家、反霸權不代表日「中」將採取共同行動、以及不接受與聯合國憲章精神相矛盾的作法，這造成了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阻礙，但日方仍然堅持以此為締約前提。⁷⁶1978年日本外相園田直在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外長會談中亦指出，日本也反霸權，但方法和中共不同，這是因為日本不想捲入也不會介入「中」蘇對立；另外，中共與東協和日本反體制鬥爭的關係也使得東協和日本人民仍然擔心中共是否會干涉其內政，因此日本希望這個條約是能讓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東協乃至世界各國都能欣然接受的。⁷⁷

由上可知，即使建立了外交關係，日本仍然在安全問題上堅持著與中共不同的立場，甚至爭取在法律上自圓其說的空間，為的就是要中共尊重其外交立場，並避免做出任何讓日本方面覺得有干涉日本內政的行為，然而，這一作法到後來卻被日本部分人士用來當作回應中共批判的擋箭牌。例如在教科書事件中，日本政府雖然表示為了增進日本與鄰國的友好親善，政府在審定教科書時會認真傾聽鄰國的批判以盡到其責任，但國土廳長官松野幸泰即認為中共批判日本教科書審查是「干涉內政」。⁷⁸中共認為自己的主張是有普世公認性的，但日本則以不干涉內政為由拒絕改變自身立場，這樣的矛盾在雙方友好期已逐

⁷⁵ 「資料 167 田中總理記者会見詳録（1972.9.30）」，霞山會編，前引書，頁 439~440、442~444。

⁷⁶ 林曉光著，益尾知佐子訳，「一九七〇年代の中日關係—中日平和友好条約の締結」，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曉光編，前引書，頁 385~386。

⁷⁷ 同前註，頁 163~164。

⁷⁸ 田中明彦，前引書，頁 122~123。

漸浮現。到了冷戰結束、國際格局產生重大變化之後，雙方認知上的矛盾也逐漸放大，從而影響到雙邊安全戰略關係。

第二節 冷戰後中共對日本認知的變化

壹、中共對日本認知的惡化

承繼著 1980 年代「中」日關係的密切化，中共認為雙邊關係已逐漸走向常軌，尤其是「六·四」事件後日本以「日中是關係很深的鄰國，在事態不明朗之際應該慎重對待」為由極力主張避免孤立中共，因此「中」日關係受損程度較其他西方國家來得低，中共也寄望「中」日關係的恢復可以成為中共和西方關係恢復的一個突破口。1991 年 8 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樹訪問中國大陸，恢復了「中」日間的首腦交流，從而全面恢復了雙邊關係。⁷⁹1992 年 10 月，日本明仁天皇開歷代天皇先例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便稱許這次訪問「將進一步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和傳統友誼，推動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向著新的廣度和深度邁進」，並指出「一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國和一個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日本保持長期穩定的睦鄰合作關係，有利於中日兩國人民，也有利於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⁸⁰

上面這段話指出了一個重點，那就是「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日本才有利於中共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在鄧小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問題是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後，和平與發展便成了「時代主題」以及中共的對外總戰略，⁸¹而 1998 年「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也將這一總戰略套用在「中」日關係上。對中共而言，走和平道路的日本必須是能夠正視歷史、深切反省，不讓錯誤重演的，然而幾十年來日本從未真正做到

⁷⁹ 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 1945-1995**，頁 391~396。

⁸⁰ 「楊尚昆主席在歡迎明仁天皇和皇后宴會上的講話（1992.10.23）」，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頁 849。

⁸¹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6~37；劉建飛、林曉光，**21 世紀初期的中美日戰略關係**（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年），頁 58~59。

這一點，為歷史翻案的呼聲反而日漸高漲，因此「和平與發展」的雙邊關係仍然還停留在「致力於」，而非已經實現。有學者指出，冷戰結束初期「中」日關係的改善是因為日美關係惡化，日本有意藉由加強日「中」關係來抵銷美國壓力，而中共也認識到改善對日關係不僅能透過日本尋求對西方關係的突破，還能從中獲取經濟利益所致，也就是說，「中」日有著擺脫美國壓力此一共同利益；然而，日本對「中」政策的特殊性乃是出於利己主義的考量，這樣的友好關係帶有極強的的目的性和不穩定性，其間被埋下的隱患一旦暴露出來就會產生相當的破壞性。⁸²其實，外交上追求國家利益各國盡皆如此，而中共能從務實角度出發提升「中」日關係，將對方之利與己方之利相結合，顯見中共此時的處理方式是相對成熟的。只是，這樣的成熟恐怕只是因為中共的「利己」與日本有所重疊所致，雙方並非因為消除歧見而真心交好，因此一旦利益發生衝突，這些歧見都將再次影響中共處理對日關係的成熟度：

1.防衛問題—蘇聯解體後，中共開始感覺到美日有聯手防範中共的傾向。1995年11月日本新《防衛計畫大綱》出爐，其中「我國周邊…依然存在著包含核戰力在內的大規模軍事力量，其中多數國家以經濟發展為背景，致力於軍事力量的擴充及現代化」等字句被中共認為是「不點名地強調了來自中國的『威脅』」。⁸³1996年《美日安全共同宣言》中所列舉的五項亞太地區不安全因素中，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事力量大規模集中、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潛在的地區爭端、大規模殺傷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四項都與中共有關，使中共認為「這份《共同宣言》深深地打上了遏制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烙印」。⁸⁴近年來，小泉純一郎派遣自衛隊前往伊拉克、推動一連串的「有事立法」、修改防衛大綱等作法亦遭中共批評為「『架空』和平憲法，背離專守防衛方針，推行其『普通國家』戰略，將日本引向一條危險的道路……增加了地區乃至世界

⁸² 任曉、胡泳浩等著，**中美日三邊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20~124。

⁸³ 同前註，頁135。

⁸⁴ 張耀武，「冷戰後的日美安保體制與台灣問題」，**日本學刊**（北京），總第63期（2001年5月），頁18~19。

新的不確定因素」。⁸⁵

2. 台灣問題—中共在台灣問題上所擔心的主要有美日安保防衛範圍和日台間政府交流的升級。1997 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提出「周邊事態」這一概念後，中共便一直懷疑日本有意將台灣納入其「周邊地區」。2005 年 2 月美日安全諮商委員會明文規定將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列入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中共立即表示美日安保不應超越雙邊範疇，並反對美日發表任何涉台共同文件藉以「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⁸⁶另外，冷戰結束後，特別是台灣完成政黨輪替後，日台間的政治、經濟與安全交流愈見熱絡，中共對「近年來日本涉台政策出現的消極動向」深表不滿，重申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領土主權和統一大業，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並要求日本落實在台灣問題上的承諾，明確反對「台獨」。⁸⁷

3. 領土領海問題—冷戰後日本對釣魚台群島動作頻頻，除了右翼份子多次登上釣魚台意圖宣示主權外，政府及民間也在東海海域進行資源調查或開發活動，引起中共關注，頻頻要求日本政府慎重行事，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態度解決東海問題。在東海大陸棚劃界問題上，中共則是否認日本「日中中間線」的單方面主張，並認為日本這種「把自己的主張強加於他人的挑釁性行為」十分危險。⁸⁸由於釣魚台主權歸屬仍有爭議，因此有大陸學者建議援引國際法院判例，忽略釣魚台的劃界效力，以求劃界問題的盡早解決。⁸⁹

從這十年的發展來看，兩國的「利己」行為已經逐漸喪失共通處，但僅僅如此並不足以說明中共對日本的觀感在冷戰後何以會如此惡化。上面所提及的

⁸⁵ 「日本政府安全政策大調整」，*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2 月 20 日，第 7 版。

⁸⁶ 「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 堅決反對美日發表涉及台灣問題的共同聲明」，*人民日報*（北京），2005 年 2 月 21 日，第 4 版。

⁸⁷ 「唐家璇國務委員會見日共同社社長山內豐彥」，*新華網*（北京），2005 年 4 月 1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16/content_2838572.htm。

⁸⁸ 「中方就日方在東海進行海洋資源調查提出嚴正交涉」，*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7 月 8 日，第 4 版。

⁸⁹ 孫伶伶，「從國際法角度分析釣魚群島主權問題」，蔣立峰主編，*21 世紀中日關係發展構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264~265。

所有問題其實早在冷戰時代就已存在，但回顧歷史卻也可以發現，日本政府的態度是影響中共對日認知的最主要因素，特別是在歷史認識上。1980年代儘管日本就曾內閣成員發表否認侵華歷史的言論，但都是少數個案，首相也大致能控制局面，然而冷戰結束後，不只閣員否認歷史、參拜靖國神社等事幾乎已成常態，即連首相本人都常出現在歷史認識上令中共認為前後不一的情況。日本在歷史認識上的倒退已成為現今中國大陸在對日關係上最為擔心的問題，就學界的立場來看，他們普遍認為日本社會的總體保守化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因，而「新國家主義」和「民族保守主義」等保守思潮則使得日本在歷史問題上逐漸改採強硬態度。

貳、日本總體保守化與歷史觀對中共認知的影響

大陸學者呂耀東在《冷戰後日本的總體保守化》一書中指出，日本的總體保守化是必然的，它受到下列四股力量的影響：⁹⁰

1. 日本政黨格局力量對比嚴重失衡—1993年自民黨的分裂並非表示保守政權的失敗，而是形成新保守勢力和傳統保守勢力的良性分裂，並在1999年之後形成了多黨聯合政權的聚合，實現「保守回歸」；在革新勢力方面，社會黨因冷戰結束所造成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打擊而被迫改變政策，承認自衛隊和美日安保條約的合法性，共產黨則是將政黨性質和路線修改為大眾性政黨和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民主改革，過去「保革對立」下的制衡力量已不復見。另外，公明黨政策的靈活性和對執政地位的追求也使其從中道走向右傾。

2. 國際環境變化—冷戰結束後，美國面對中共的崛起和朝鮮半島的複雜局勢，迫切需要一個能夠強化美日安全同盟的親美保守政權，而保守政黨則透過加強對美合作來擴大國際政治參與，例如支持美國反恐、派兵伊拉克等。

⁹⁰ 呂耀東，*冷戰後日本的總體保守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58~269。

3.日本國會選舉制度的改革—小選區制造成了小黨單獨推薦的候選人難以取勝，政策趨同的政黨聯合推薦候選人人才有望當選。這不僅導致革新勢力向保守勢力妥協，也造成了保守勢力的統合。

4.社會結構—日本經濟的飛快發展造就出龐大的白領階級，強化了國民的「中流（中間）意識」，拒絕變革、缺乏批判精神和思想保守成為社會主流意識。但這樣的「中流意識」已因日本經濟不景氣而產生變化，一部份人轉而不關心政治，另一部份人則認同民族主義，謀求政治大國地位。

這股保守化趨勢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愈演愈烈，甚至形成了「政界右派和民族派向企業施壓→企業透過廣告控制迫使左派媒體趨向保守→媒體為確保財路而向財界退讓、趨向保守→保守媒體加強了民眾的保守傾向→保守民意進一步強化了保守政治勢力」的循環，而且因為日本社會對此缺乏遏止機制，因此「保守循環化」仍在持續當中，⁹¹其所鼓吹的「新國家主義」也逐步轉化為具體政策。從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到1990年代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儘管兩者的新國家主義主張因為冷戰的結束而有所差異，但本質上兩者都主張政治改革、強化首相權限、加強日美同盟、打破戰後政治「禁區」、增強日本防衛力量、修改憲法及實現政治大國理想等，進一步使日本邁向了經濟、政治以及軍事大國的發展道路。⁹²

除了老一輩的國家主義者之外，吳季南認為，新生代政治人物具有較濃厚的保守主義傾向，在敏感問題上不迴避自己的觀點，開始勇於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受特定政黨或派系的束縛，而且受歐美文化影響較深，外交上多採取積極進取的姿態，因此他們不同於模稜兩可、依賴派系、與中國淵源較深的老一輩政治家，而是重視國家利益，強調日本的國際參與，對歷史問題則極少抱

⁹¹ 高洪，「當前政治局勢中值得注意的四個問題」，*日本學刊*（北京），總第73期（2003年1月），頁88。

⁹² 孫政，*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12~313。

持著歉疚感和贖罪意識。⁹³徐之先也指出，日本為實現政治大國理想而開始調整對「中」政策，企圖將因歷史問題造成的「特殊關係」改為面向未來的「普通關係」，而日本的贖罪意識因老一輩人的去世而淡薄，因此日本在發展日「中」關係時改變了過去的低姿態，而採取不輕易讓步的強硬態度。⁹⁴

也就是說，大陸學者認為日本在冷戰後的日「中」關係上有意擺脫歷史問題的包袱，進而掌握更多主動權，以確保並擴大其國家利益。這種謀求擴大國家利益基礎的思維被稱為「保守民族主義」，其特色為否定日本侵略歷史、反對「一國和平主義」、鼓吹恢復日本自信心和民族精神，在國際上發揮更大作用，而其內涵則是追求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時通過改革保守政黨的政治路線和施政綱領去治理國家。⁹⁵至於保守民族主義的歷史觀，則可以追溯至日本的傳統宗教—神道。

神道的核心思想為：萬物萬事皆為天照大神所創，而天皇為天照大神之子孫，神皇一統、萬世一系。經過了神社神道及教派神道階段，明治維新前發展出復古神道，主張天皇繼承了天照大神以來的神學思想傳統，故天皇不僅是日本最高統治者，也應當統治世界。⁹⁶這一思想隨著明治維新後的神道國教化而逐漸成為所謂「皇國史觀」，體現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軍人勅語」和「教育勅語」之中。皇國史觀強調天皇在法律、道德和宗教上的絕對正確性，造就出絕對天皇制和極端民族主義，因此在日本戰敗後失去其法律地位。新憲法明定政教分離，解除了神道的國教地位，天皇也發表了「人間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非神，但即便如此，天皇依舊存在，戰前軍國主義勢力並未肅清，加上政府有意無意地凸顯祭祀戰死「英靈」的靖國神社地位，因此「皇國史觀」

⁹³ 吳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及其影響」，*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36 期（1996 年 11 月），頁 58~60。

⁹⁴ 徐之先主編，*中日關係三十年（1972-2002）*（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頁 214。

⁹⁵ 桐聲，「當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義」，*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81 期（2004 年 5 月），頁 2~3。

⁹⁶ 關於神道的內容，可參照王中田，「神道教倫理思想的現代闡釋」，*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78 期（2003 年 11 月），頁 124~135。

並未真正消失。

另外，日本遺族會的成立也是此種歷史觀仍然存在的原因之一。大陸學者認為，日本人有「恥感文化」，強調人不可蒙受恥辱，因此其無自我懺悔的習性，加上日本人的生死觀認為人一旦去世，其在世的功過便將一筆勾消。⁹⁷日本遺族會成員正是基於這種心態，不願戰死的親人受辱而影響到自己的名聲，因此不願承認過去戰爭的負面性。⁹⁸既然不能讓戰死者名譽受損，那便需要建立其發動、參與戰爭的正當性，在這樣的邏輯下，所謂「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和「自由主義史觀」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教科書問題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更是毫無疑問地會不斷出現。

一旦中共真的認為日本政治的保守化是無可避免的，那麼會擔心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倒退是相當自然的，同時因為這樣的保守化是全面性的，因此中共在面對歷史問題時顯然又回到建交前的狀態，即其不信任是針對日本政府、甚至是針對首相個人的。自 1995 年村山富市之後，歷次日本首相訪問中國大陸時不是得處理歷史問題，就是要參訪抗日戰爭紀念設施（見表 2-2）。小泉純一郎在 2002 年再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後，雙方政府首腦互訪即告中斷，中共並抨擊其連續五年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有負於兩國先人，有負於兩國子孫，最終必將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⁹⁹2005 年 5 月，中共副總理吳儀在中國大陸爆發多起反日示威後訪日，卻在預定與小泉會面的當天突然離日，引起日本一陣譁然，中共外交部雖稱是因需處理緊急公務所致，但其發言仍然透露出對吳儀訪日期間小泉宣布仍將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的不滿。¹⁰⁰

⁹⁷ 吳寄南、陳鴻斌，前引書，頁 19~20。

⁹⁸ 張碧青，「批判皇國史觀任重道遠——讀《日本戰後遺族透析》有感」，*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63 期（2001 年 5 月），頁 133~134。

⁹⁹ 「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 嚴厲譴責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人民日報*（北京），2005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

¹⁰⁰ 「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 日本領導人連續就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發表不利於中日關係改善的言論令人遺憾」，*人民日報*（北京），2005 年 5 月 24 日，第 4 版。

表 2-2 「中」日間政府首腦互訪（1989-2005）

出訪時間	出訪人士	備註
1991.8.10	海部俊樹（首相）	象徵「六·四」後「中」日關係的全面恢復
1992.4.6	江澤民（中共總書記）	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週年
1992.10.23	明仁天皇	有史以來日本天皇首次訪「中」
1994.3.19	細川護熙（首相）	表示將把日「中」關係發展為面向未來的日「中」關係
1995.5.2	村山富市（首相）	表示「要把戰後五十週年作為日中關係的新的出發點」 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
1997.9.4	橋本龍太郎（首相）	就美日安保新指針進行意見交換 戰後首訪東北的日本首相，參觀「九·一八」事變博物館
1997.11.11	李鵬（總理）	擬「建立旨在面向未來的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係」
1998.4.21	胡錦濤（國家副主席）	
1998.11.25	江澤民（國家主席）	決定構築「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係」 發表《中日共同宣言》，但兩首腦因歷史認識歧見未簽字
1999.7.8	小淵惠三（首相）	意圖修復因歷史問題而受損的日「中」關係 構築「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友好合作伙伴關係」
2000.10.12	朱鎔基（總理）	首度上日本電視節目與日本國民進行對話
2001.10.8	小泉純一郎（首相）	為期僅一天的工作訪問 參觀蘆溝橋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資料來源：整理自徐之先主編，*中日關係三十年（1972-2002）*，頁 433~516。

從中曾根康弘之後，「參拜的目的在於追悼為保衛祖國和同胞獻出了寶貴生命的陣亡者」之類的說法一直是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主要理由。儘管他們也都知道參拜靖國神社會引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反彈，因此不是在參拜的同時表示對過去深感反省，就是以避開「八·一五」終戰紀念日來降低敏感度，但中共從未對此參拜行為表示過一絲的認可和理解。就中共的看法，反對靖國神社公式參拜的原因有幾個：

1. 靖國神社中供奉著十四位甲級戰犯，他們是軍國主義的代表、侵華戰爭的元兇，是配不上稱之為「英靈」的，參拜靖國神社無異肯定了甲級戰犯的作為，這是否定歷史、歪曲歷史的表現；

2. 違反日本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既然戰後日本憲法規定政教分離，神道失去國教地位，則代表政府的首相自然不應該以官方身份進行參拜。2004

年4月，福岡地方法院首次做出了違憲判決，認為小泉參拜造成了支持推廣神道教義的靖國神社的後果，故違反憲法第20條禁止宗教活動的條文。¹⁰¹這個判決自然加強了中共反對靖國參拜的氣勢；

3.參拜問題不只是日本內政問題，而是外交問題。針對日本部分人士聲稱參拜問題屬日本內政，外國無權干涉，中共駐日大使王毅明白指出：「我們瞭解日本的文化和生死觀，但這一問題已超出日本的內政，也不純粹是所謂文化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是非曲直和國際正義的嚴肅的外交問題」。¹⁰²大陸學者劉江永更進一步指出：凡違反國際法或涉及「國際關心事項」（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的行為即不得解釋為「內政」，一國針對「國際關心事項」提出本國的正確主張不能稱之為「干涉」，而是主權國家的合法權利。¹⁰³

由上可知，中共官方近年來對日本政府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態度是非常不滿的，並直接影響到「中」日雙邊的高層往來。事實上，由於中共對日本歷史態度的抨擊力道持續增加，民間的對日觀感也大為惡化。

參、歷史問題與中國大陸民間對日觀感的惡化

1988年和1992年，日本每日新聞社和亞洲研究會主辦過兩次「中日印象共同輿論調查」，當時中國大陸民眾對日本抱有好感的比例皆高於討厭日本的比例，對今後「中」日關係走向表示樂觀的也超過半數（見表2-3），然而在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週年之後，雙方圍繞歷史認識問題摩擦不斷，大陸民眾對日本的觀感也開始惡化。¹⁰⁴1997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和日本方面（朝日新聞與日本研究中心）進行過四次的共同輿論調

¹⁰¹ 蔣立峰，「福岡判決與小泉參拜」，*日本學刊*（北京），總第81期（2004年5月），頁50。

¹⁰² 「王毅大使在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記者招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年10月18日，<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165796.htm>。

¹⁰³ 劉江永，*徬徨中的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75~177。

¹⁰⁴ 劉志明，「中日相互輿論的變遷與媒體的作用」，*中日關係新思維與輿論*（北京：JCC中日傳播網，2003年），<http://www.jccnet.cn/yth/2003/2003-9.htm>。

表 2-3 「中」日印象共同輿論調查 (1988、1992)

中國大陸部分	對日本的好感度			今後五年內的「中」日關係走向		
	喜歡	討厭	不好不壞	好轉	惡化	不好不壞
1988	36%	28%	35%	50%	5%	44%
1992	40%	29%	31%	69%	2%	29%
日本部分	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			今後五年內的「中」日關係走向		
	喜歡	討厭	不好不壞	好轉	惡化	不好不壞
1988	57%	6%	35%	80%	3%	16%
1992	40%	13%	45%	65%	2%	27%

資料來源：整理自真鍋一史，「第 13 章 日中關係と世論」，增田弘、波多野澄雄編，*アジアの中の日本と中国*（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 年），頁 294~297。

查，¹⁰⁵結果都顯示中國大陸民眾討厭日本的比例高過了喜歡日本的比例（見圖 2-1），尤其是 2002 年討厭日本的比例一度突破五成，社科院新聞所教授劉志明認為是歷史認識問題隨著教科書事件和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而進一步惡化，從而使得中國大陸民眾開始出現歷史問題與對日情感同步惡化的趨勢。¹⁰⁶不過，2004 年討厭與喜歡日本的比例大幅拉近，劉志明則表示這是因為大陸媒體開始出現了部分理性分析「中」日關係的文章，以及「中」日間的非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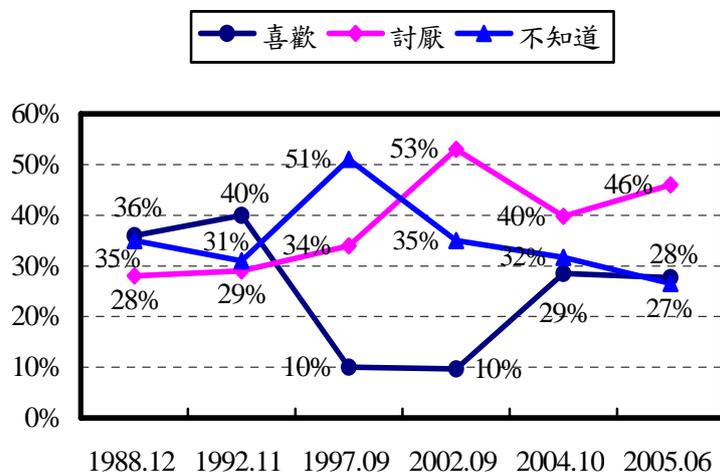


圖 2-1 中國大陸民眾對日本的觀感：「中」日共同調查 (1988-2005)

資料來源：整理自真鍋一史，前引文；「朝日新聞社・中国社会科学院 共同世論調查」，*朝日新聞*（東京），2002 年 9 月 27 日，第 8~9 版；「『日中關係についての国際比較世論調査』の結果（詳細版）」，*日本リサーチセンター*，http://www.nrc.co.jp/rep/pdf/rep20050715_01.pdf；「2004 年對日意識調查數據」，*中國調查網*，<http://www.comrc.com.cn/crc/yldc/dryldc/002.htm>。

¹⁰⁵ 這四次調查分別舉行於 1997、2002、2004 及 2005 年。相關數據來源見圖 2-1。後文將不再加以說明。

¹⁰⁶ 劉志明，「中日相互輿論的變遷與媒體的作用」，前引文。

領域的交流大大增加所致。¹⁰⁷

另外，1997 年和 2002 年的兩次調查顯示，81% 的中國大陸民眾認為「中」日之間的主要問題是歷史認識問題（2002 年），86% 認為日本在歷史問題補償上做得不夠；在日本面對歷史問題首先最應該做出什麼努力的問題上，認為日本首應衷心謝罪的從 28% 增加至 41%，認為日本首應充實歷史教育的維持在 25% 左右，至於主張不論過去、創造新的合作關係的則從 20% 降至 14%。2004 年和 2005 年的調查則顯示，認為要改善「中」日關係的最必要工作已經從「經濟交流」（2004 年，54.2%）變成了「歷史問題的相互理解」（2005 年，45.5%），而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也高達 82.2%。以上資料都顯示出歷史問題的確深深影響著中國大陸民眾對日本的觀感。2005 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與日本「言論 NPO」主辦的「『中』日共同輿論調查」也顯示，認為歷史問題是妨礙「中」日關係健全發展主因的有八成，而在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上，有 35.9% 認為日本應該採取更照顧到中國大陸民眾感情的作法，另有 33.8% 認為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¹⁰⁸

不過，因為歷史問題而討厭日本似乎不代表大陸民眾就此把日本當成安全上的威脅。中國社科院新聞所的調查結果就顯示大陸民眾心中最具軍事威脅的國家是美國而非日本（見表 2-4），而「言論 NPO」的調查雖然顯示大陸民眾認為主導日本社會的政治思潮依序是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但認為

表 2-4 中國大陸民眾感到有軍事威脅的國家（1997-2005）

	美國	俄羅斯	日本	南韓	北韓	印度	其他	沒有
1997	54%	3%	21%	0%	0%	1%	2%	10%
2002	60%	2%	13%	--	0%	4%	0%	6%
2005	66%	2%	16%	0.3%	0.6%	0.7%	2.3%	12.5%

資料來源：整理自「朝日新聞社・中国社会科学院 共同世論調查」；「『日中關係についての国際比較世論調査』の結果」，頁 8。

¹⁰⁷ 「中國人到底怎麼看日本」，**環球時報**（北京），2004 年 12 月 15 日，第 14 版。

¹⁰⁸ 「日中共同世論調查—中国編」，**言論 NPO**，2005 年 8 月 30 日，http://www.genron-ngo.net/about_history/000895.html。

日本軍事擴張路線是妨礙「中」日關係健全發展主因的僅四分之一，遠落後於歷史問題，而認為美國對日影響是妨礙「中」日關係健全的更只有一成五。¹⁰⁹

由上可知，認為歷史問題是阻礙「中」日關係主因的想法是中共官方、大陸學界和民間所共有的，但日本是否會因為「中」日關係的惡化而成為中國大陸的安全威脅則是呈現出官方、學界較民間為擔心的態勢。儘管如此，歷史問題會讓中共對日本的認知更加傾向負面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過去的歷史造成了中共對日本的不信任，加上兩國間的外交問題很多都是戰後所遺留下來的，因此只要「中」日關係陷入低潮，新仇舊恨就會一起成為雙邊關係的障礙。

肆、台灣問題重要性的提升

除了歷史問題之外，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之間的重要性已經日漸受到重視，甚至與歷史問題並列。鑑於近年來日台政治關係的升溫，中共官方的立場是：發展「中」日關係要正確處理好歷史和台灣問題，要求日本重新認識並嚴格恪守日「中」間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¹¹⁰ 學界則是注意台灣在日本國家利益上的戰略意義，例如余永勝認為，雖然一般認為美國因素在台海問題中扮演關鍵角色，但目前美日的影響力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趨勢，這是因為日本在台灣擁有更多戰略利益的關係—除了牽制中共外，台灣更是卡住日本海外生命線中脖子地段的區域，配合上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力未消，導致「日本插手台海事務的不軌之心越來越強」。¹¹¹ 晉林波也認為，一般中國大陸民眾提到「中」日關係時多會想到歷史問題，而媒體也甚少對台灣問題給予重視，但實際上台海問題對日本而言比對美國還要複雜，因為日本不但不願意看到中國統一，台灣海峽也對日本海上戰略通道意義重大，加上過去的歷史聯繫經過了政界、學界的再生產進一步得到加強，因此「中」日之間

¹⁰⁹ 同前註。

¹¹⁰ 「胡錦濤會見日本執政兩黨幹事長」，*人民日報*（北京），2005年5月23日，第1版。

¹¹¹ 余永勝，「台海問題日本因素竄升」，*世界報*（北京），2004年12月29日~2005年1月3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sjb/50/wz03.htm>。

的台灣問題不亞於「中」美之間的台灣問題，甚至可以說，台灣問題已經成為比歷史問題更緊迫、也更危險的問題，未來台灣問題將成為「中」日關係中最難啃的骨頭。¹¹²

伍、「中」日合作的瓶頸：「以史為鑑」重於「面向未來」

當然，與日本撕破臉並不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而「中」日之間也並非沒有合作的空間。近年來「中」日的合作領域從經濟擴大到政治安全領域，例如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和東協十加三（ASEAN+3）的多邊合作對話、雙方領導人、政府要人和軍事高層的互訪、在區域安全問題上的協調等。儘管過去十年「中」日之間產生了許多波折，但中共的官方立場仍然是要盡力維持「中」日關係。除了國家戰略利益和地緣政治的需要之外，日本政府的「自制」可能也是至今中共仍未放棄日本的原因之一，例如村山富市在要求中共停止核試驗的同時表示不考慮將此問題與日圓貸款掛勾，¹¹³橋本龍太郎對右翼勢力在釣魚台的舉動「不支持、不承認、不批准」，¹¹⁴小泉純一郎更公開表示中共不是日本的威脅，而是日本的「機會」。¹¹⁵冷戰後十餘年來，「中」日雙方在重視雙邊關係的前提下力圖增進合作、低調冷靜處理爭議，因此並未陷入如同冷戰前期那般的敵對狀態，中共對日本仍有所期待。2004年10月18日，中共駐日大使王毅在日本首次召開的記者會中再次地表明了中共領導人及政府高度重視「中」日關係的立場，並提出了「維護一個基礎，推進三個目標」¹¹⁶的說法，然而就中共的言行來看，「以史為鑑」一直是中共用以

¹¹² 「中國關注日台關係升溫 學者認為中日外交問題中台灣問題更危險」，**大公報**（香港），2004年2月23日，第5版。

¹¹³ 「資料 338 村山總理と江沢民国家主席の会談要旨を伝えた邦字紙記事（1995年10月22日）」，霞山會編，前引書，頁822。

¹¹⁴ 任曉、胡泳浩等著，前引書，頁148。

¹¹⁵ 吳寄南、陳鴻斌，**中日關係“瓶頸”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頁48。

¹¹⁶ 「一個基礎」是指中日之間的三份官方文件，特別是日本對侵略戰爭的反省及一個中國的原則。「三個目標」則指：（一）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二）互利合作、世代友好；（三）和平發展、共振亞洲。見「我駐日大使舉行記者招待會 闡述中國對日政策」，**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10月19日，第3版。

要求日本改善「中」日關係的前提，在歷史問題解決之前中共並無法做到「面向未來」。不論是期待也好，重視也好，都需要有成熟的態度以及共同的利益配合。中共越是在對日問題上訴諸情緒性字眼，國內的非理性民族主義聲浪就越是高漲，從而製造出更多的障礙，窄化共同利益存在的空間。另外，從大陸輿論來看，認為日本應為「中」日關係不佳負上全部或大半責任的多達八成，而認為大陸方面應負大半或全部責任的則不到 1%，¹¹⁷一旦幾乎所有人都把責任推給對方，那麼便很難反省己方是否也有該檢討的部分，這對「中」日關係的發展是相當不利的。

第三節 冷戰後日本對中共認知的變化

冷戰時期，日本一方面視中共為歷史、地理上不可忽視的鄰國，因此不欲讓雙邊關係陷入僵局，甚至在建交後努力塑造「日『中』友好」的氣氛，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擔心中共會對其安全構成威脅，而這一現實層面的憂慮在冷戰後隨著中共經濟、軍事能力的擴張而增大，甚至有了「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一般日本民眾的對「中」觀感也趨於惡化，「日『中』友好」熱潮退去。

壹、日本對中共認知的惡化：「中國威脅論」的興起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前，日本政府認為維持發展日「中」友好關係這一對「中」政策的基本乃是日本外交相當重要的一根支柱，並希望在和平合作、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和文化交流三方面加強和中共的關係，同時以日「中」共同聲明、日「中」友好和平條約和四原則做為日「中」關係的基礎。¹¹⁸即使是「六·四」發生後，日本在對中共的鎮壓行為提出譴責的同時也對西方工業國家的經濟制裁主張採取保留立場。日本仍然強調和中共之間地理和歷史上的特殊關係，這是和西方國家不同的，而現

¹¹⁷ 「日中共同世論調查—中国編」，前引文。

¹¹⁸ 「資料 277 竹下總理と李鵬總理の会談要旨を伝えた邦字紙記事（1989 年 4 月 12 日）」，霞山會編，前引書，頁 740。

實上日本在中國大陸有著龐大的經濟利益，地理上的接近使得日本擔心中共因為經濟發展停滯而發生動亂並波及日本，以及日本對中國大陸的贖罪意識，這些都是日本不願採取懲罰性制裁措施的原因。¹¹⁹日本這時候所擔心的是中國大陸的無政府化、無秩序化乃至於解體，也就是擔心衰弱的中國大陸會造成地區的不安定，因此這時候的日本並非把中共看成強大的威脅，而是要避免中共弱化而四分五裂。¹²⁰此時的日本認為，中共以經濟發展為優先，因此國防預算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應不至於大幅增加，而財政上中共受到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和「六·四」後西方國家制裁的影響，因此其國防全面現代化難以快速實現。¹²¹

然而自 1992 年之後，日本開始注意到中共國防預算連年以二位數成長，加上中共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將釣魚台群島明確列於其領土範圍內，海軍在西沙、南沙群島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1993 年起更多次展開地下核試爆，日本乃開始加強對中共軍力發展的注意，除了以 ODA 四原則¹²²試圖避免其援助遭中共挪用於增強軍備之外，並要求中共提升其國防經費的透明度、在核試爆上採取自我克制的態度及要求中共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¹²³日本認為，中共致力於以核武、導彈和海、空軍戰力為中心的軍事現代化，但在國防經費上並未詳細列出各項支出，其公布的部分也僅為實際用於軍事目的之經費的一部份，而在國防政策上中共並未公布其各式裝備的數量、整編進度、部隊編成和軍隊主要用途

¹¹⁹ 宮下明聰，「第 2 章 援助外交における国益と外圧」，宮下明聰、佐藤洋一郎編，**現代日本のアジア外交—対米協調と自主外交のはざままで—**（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 年），頁 58-59。

¹²⁰ 猪口孝，**現代国際政治と日本—パールハーバー50年の日本外交**（東京：筑摩書房，1995 年初版 4 刷），頁 256。

¹²¹ 防衛庁編，**防衛白書（平成 2 年版）**（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90 年），頁 67-68。

¹²² ODA 四原則為：（一）開發與環保並重；（二）避免用於軍事用途及助長國際紛爭；（三）注意軍費支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飛彈的開發製造、以及武器輸出入的動向；（四）促進受援助國的民主化和市場經濟，並注意基本人權及自由的保障情況。

¹²³ 「資料 328 村山総理と江沢民国家主席、李鵬総理との会談要旨を伝えた邦字紙記事（1995 年 5 月 3 日）」，霞山会編，前引書，頁 812-813。

和實績等，這些都是透明度不足的地方，因此「應謹慎判斷解放軍的現代化目標是否超過了『中國』國防的必要範圍，並且有必要注意今後這一現代化的動向」。¹²⁴1995 年後，中共海洋調查船和海軍艦艇在日本近海及日本聲稱的專屬經濟海域內的海洋調查活動大幅增加，意圖蒐集東海的水文和海洋資源分佈等資料，而海軍的活動範圍也逐漸向遠洋擴張，這使得日本擔心中共海軍有朝「遠洋海軍」發展的可能性。¹²⁵日本政府雖然一再表示不認為中共是日本的威脅，但其從擔心中共四分五裂到擔心中共成為軍事強權的認知轉變是相當明顯的。有別於過去擔心中共經濟發展受挫而不願輕易以 ODA 制裁中共的立場，如今日本看到中共經濟的巨大發展以及軍力的擴大，已經興起了停止對「中」ODA 的念頭。¹²⁶

事實上，早在 1990 年日本防衛大學校副教授村井友秀就已指出，中共擁有全球最多的人口和豐富的天然資源，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國家，其軍隊規模不但為世界第一，近年來更有專業化、機械化的傾向，加上中共仍抱持著戰國時代的世界觀，努力創造成為霸主的條件，因此中共對意圖走向政治大國的日本而言是一個潛在的大威脅。這被認為是日本「中國威脅論」的濫觴。¹²⁷前防衛研究所亞洲地區研究室長茅原郁生則進一步指出，所謂「中國威脅論」主要來自於中共持續強化其核武戰力和轉移核武技術、中共對外的武器移轉和軍事交流、中共海洋活動和海軍戰力的擴大、以及中共國防經費的增加和內容的不夠透明。¹²⁸除了中共的國家潛力和軍事動向之外，學者天兒慧認為古代中國傳統文明所產生的大國形象和中共過去「革命輸出」的形象相結合容易造成「

¹²⁴ 防衛庁編，**防衛白書（平成 17 年版）－日本の防衛 より危機に強い自衛隊を目指して**（東京：ぎょうせい，2005 年），頁 55~56、58。

¹²⁵ 日本認為，一旦中共海軍擁有遠洋戰力，則將具有控制距離沿海 1500 海里以上遠方海域（包括黃海、東海、南海）事態的能力。見防衛庁編，**防衛白書（平成 16 年版）－日本の防衛 防衛庁・自衛隊発足 50 年を迎えて**（東京：国立印刷局，2004 年），頁 59。

¹²⁶ 「対中 ODA、『もう卒業の時期』 首相、廃止可能性に言及」，**朝日新聞**（東京），2004 年 11 月 29 日，第 3 版。

¹²⁷ 何思慎，前引書，頁 176~177。

¹²⁸ 茅原郁生，「〔徹底分析〕中国軍事力」，**中央公論**（東京），第 110 卷第 3 号（1995 年 2 月），頁 179~180。

想像上的威脅」，而中共欲提升其國際影響力的意圖客觀上也讓周邊國家產生了威脅感。¹²⁹新聞評論家船橋洋一針對近年來中共為緩和其他國家對中共崛起的憂慮而提出的「和平崛起」主張，除了認為「崛起」帶有「突然、急速」抬頭之意，反而可能引起「中國威脅論」之外，也指出中共歷年來共發動十一次對外作戰，近年來的國防現代化和軍隊任務的擴張、國防經費的大幅成長令人懷疑「和平崛起」的真正內涵，甚至懷疑中共只是以「和平」作為「崛起」的手段，以實現鄧小平的「韜光養晦」。¹³⁰

也就是說，中共近年來的國防現代化因其意圖不明而引起日本不安，日本只得藉助歷史經驗判斷，結果答案是令人憂慮的。學者 Tow 在 1998 年所進行的調查或許可作為一個例證。在這次調查中，二十位受訪的日本防衛專家中竟有五成五認為中共是霸權的、企圖在亞太地區擴張影響力的；在「中共被視為威脅的可能原因」部分，有四成五認為是中共軍事現代化，有三成五認為是中共領土野心的增強，¹³¹這顯示出在日本的眼中，中共的軍事現代化是帶有外向性、威脅性的。

貳、日本對「歷史問題」立場的強硬化

從上面的說法可以發現，中共實力的發展與過去歷史的結合是讓日本產生「中國威脅論」認知的主因，但與中共著重強調日本侵華歷史的立場不同，日本所重視的反而是中共政權建立後的歷史紀錄，以及對中共有意恢復過去「華夷秩序」的不安，在侵華問題上日本不但沒有進一步軟化，反而有強硬化的傾向，不但不認為這段歷史應該影響日「中」關係的發展，甚至公然衝撞中共的歷史觀。對日本而言，歷史問題主要可分為兩方面：

¹²⁹ 天兒慧，「序章 中国は脅威か」，天兒慧編著，*中国は脅威か*（東京：勁草書房，1997年），頁 7~8。

¹³⁰ 船橋洋一，「協調政策の模索の背景を読む 中国は自らに『緊箍咒』をか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か」，*中央公論*（東京），第 119 卷第 8 号（2004 年 8 月），頁 107~109。

¹³¹ 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1.

1.對傳統「中華思想」的敏感—認為中共仍抱持著古代的世界觀，不可能誠心和周邊國家平等往來，並擔心中共崛起後有恢復「華夷秩序」的意圖。武者小路公秀就認為過去中共的「懲越戰爭」就隱藏有「華夷秩序」的影子，而未來也將在南北韓問題上扮演著如同華夷秩序道義中心的角色。¹³²袴田茂樹認為中共不能接受日本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是因為潛意識不認為日本有資格和中共平起平坐，因此質疑日「中」是否真能在對等關係下締結友好關係。¹³³船橋洋一則認為中共即使無意成為如美蘇般的超級大國，也有意恢復過去的朝貢貿易式支配體制，亦即單向施惠的階層式秩序觀。¹³⁴野田宣雄則認為中共藉著「九一一」後和美國合作反恐的機會專注於建構華夷秩序，除了加緊對新疆維吾爾族分離運動的鎮壓外，在台灣、北韓、香港和東南亞等地也逐漸擴大其帝國影響力，而美國軍力被牽制在伊拉克更給了中共追求帝國秩序的良機。¹³⁵中嶋嶺雄則認為中共有把日本看成朝貢國的傾向，將釣魚台群島視為其領土也是基於這種意識，但他也警告日本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朝貢國，日本人必須有這樣的自覺。¹³⁶

2.對中共處理歷史問題態度的不滿—日本對中共可能重建「華夷秩序」的不安，某種程度上是受此影響的。日本侵華的歷史讓許多日本人在面對中國大陸時是抱著歉疚感的，因此他們希望藉由提倡日「中」友好和協助中共現代化建設以彌補過錯，而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也是採取較為克制的立場，避免過度刺激中共。然而，由於中共始終沒在歷史問題上真正原諒日本，使得日本內部產生了不滿，認為日本對中共的「軟弱外交」、「贖罪外交」根本只是讓中

¹³² 中江要介、武者小路公秀、河辺一郎（司會），「大国意識の轉換」，**中国** 21（名古屋），創刊号（1997年9月），頁102。

¹³³ E・ヴォーゲル、船橋洋一、袴田茂樹、田中明彦，「中国の挑戦 試される日本の安全保障戦略」，**中央公論**（東京），第107卷第11号（1992年11月），頁124。

¹³⁴ 船橋洋一，前引文，頁109~110。

¹³⁵ 野田宣雄，「中国の『帝国秩序構築』に日本は対抗戦略をもちうるのか」，**中央公論**（東京），第119卷第11号（2004年11月），頁75~77。

¹³⁶ 中嶋嶺雄，「ODA を取りやめ 对中国外交のあり方も見直せ」，**中央公論**（東京），第120卷第3号（2005年3月），頁130。

共有理由一直擺出高姿態，動輒將自己的價值觀加諸在日本身上，指責日本令中共不快的作為，認為「中」日間的所有問題都該由日本負責任，結果反而招致了日本民眾對中共支持度的下降。¹³⁷這種被中共壓著打的處境引起了日本保守派人士的抨擊，他們除了反駁中共的歷史觀，更對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有所不滿。

保守派主張日本的近代史除了侵略的一面之外，也有諸如日俄戰爭的自衛史和幫助台灣現代化、讓台灣人心存感謝的一面；戰後日本未再以國家之力殺害任何一個人，但中共卻對內殘酷鎮壓、對外屢屢發動戰爭，因此日本根本沒有必要被中共的「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論」指指點點。¹³⁸他們也不斷質疑中共對日本戰爭犯罪指控的真實度，並認為中共一方面指責日本刺激其人民感情，一方面又對過去發動政治運動整死數千萬人之事輕描淡寫，其態度可謂矛盾，日本應該予以駁斥，以免遭國際看輕。¹³⁹更甚者則質疑中共頻頻打出「歷史牌」的動機，認為中共透過愛國主義教育利用輿論攻擊日本，實際上根本就是機會主義，視情況將歷史問題與經濟、外交等掛勾，用以要脅日本，並造成日本國內輿論的分裂，¹⁴⁰而其真正目的在於離間日本與美國，靖國問題只是突破口，日後會一步步向能源、領土、台灣問題進逼，終至日美關係。¹⁴¹也就是說，日本已經開始認為一味強調友好與忍讓只是讓日本在對「中」外交上陷入不利處境而已，既然如此日本就沒有必要繼續讓步；而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也讓日本認為和中共談是不會有結果的。在 Tow 的調查中，受訪者面對「假設中共將成或已成威脅，有無可能與中共討價還價」這一問題時，有四

¹³⁷ 見中嶋嶺雄，「天皇訪中と日本外交」，**中央公論**（東京），第 107 卷第 9 号（1992 年 9 月），頁 43~45；E・ヴォーゲル、船橋洋一、袴田茂樹、田中明彦，前引文，頁 135。

¹³⁸ 中嶋嶺雄，「ODA を取りやめ 对中国外交のあり方も見直せ」，頁 131~132。

¹³⁹ 石原慎太郎，「北京五輪を断固ボイコットせよ」，**文藝春秋**（東京），第 83 卷第 8 号（2005 年 6 月），頁 97~98。

¹⁴⁰ 岡崎久彦，「中国外交硬直化の背後に垣間見える軍の影」，**中央公論**（東京），第 120 卷第 8 号（2005 年 8 月），頁 92~93。

¹⁴¹ 「国論を二分する大激論 小泉総理『靖国参拜』はか非か」，**文藝春秋**（東京），第 83 卷第 9 号（2005 年 7 月），頁 134。

成五認為日本必須採強硬立場才能和中共談，三成則認為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堅定，只願意討論不涉及中共長期戰略的戰術層次，因此日本和中共沒得談，¹⁴²這反映出了日本對日「中」和解抱持悲觀態度的一面。

日本方面當然也有認為日本在戰爭認識方面有所不足的聲音。前駐「中」大使中江要介認為，在當前的日「中」關係上，日本對過去戰爭的反省不徹底以及無法理解靖國神社公式參拜的真正問題所在，總結起來就是對中日戰爭的認識不夠徹底。¹⁴³學者北岡伸一則認為，戰後的日本由一個最不可能清算歷史的政黨執政，導致個人在戰爭中的責任未被追究，因此在歷史問題上始終是態度曖昧，失去其他國家的信任，害得全體日本人都成了壞人。¹⁴⁴加美光行則認為，多數日本人不像中國人一樣曾親身經歷日中戰爭，即使是實際參戰者也鮮少有人願意回到舊戰場憑弔，因此難以像中國人一樣把日中戰爭的歷史經驗傳承給下一代，當前日本青年對日中戰爭的關心程度也遠不如經由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得到經驗傳承的中國大陸青年；此外，日本追隨了西方的戰爭觀，加上對殖民地的侵略和統治並不違反當時由列強所制訂的國際法，因此把中國當成半殖民地的日本自然不認為自己有錯，而這也造成了東亞互信機制產生的困難。¹⁴⁵

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不認為錯全在日本。中江要介就認為中共不應該忘記雙方政治體制的差異，不應該把少數人物的不當主張看成是廣大日本人民的想法，並指出誹謗無法解決問題，只會徒增日本的反感。¹⁴⁶豬口孝將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歷史稱為「歷史的負債」，而這一負債讓中共得以利用日本的虧

¹⁴² Tow, op. cit., p. 72.

¹⁴³ 中江要介，「二十一世紀の日中關係」，*中国* 21（名古屋），總第 10 号（2001 年 1 月），頁 2~4。

¹⁴⁴ 北岡伸一，「歴史の検証と個人の責任—戦後五〇年決議をめぐって」，*中央公論*（東京），第 110 卷第 11 号（1995 年 8 月），頁 41。

¹⁴⁵ 白鋼、張琢、加々美光行，「中国政治の行方と日中關係」，*中国* 21（名古屋），創刊号（1997 年 9 月），頁 14~18；加々美光行、嶋倉民生、劉傑、古森利貞，「歴史に学び新世紀を拓く」，*中国* 21（名古屋），總第 10 号（2001 年 1 月），頁 29~30。

¹⁴⁶ 中江要介，前引文，頁 2~6。

欠感來要求日本增加對中共的援助，並成為中共轉移內部不滿的出處，而中國大陸人民也可藉由反日而忘記自身缺點。¹⁴⁷古森利貞則指出，中共動輒以「右翼」或「軍國主義復活」批判日本，在指責日本「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同時並未考慮到如此是否也傷害了日本民眾的感情，而中國大陸內部根深蒂固的反日思潮不但有把「知日派」、「親日派」打為「漢奸」的傾向，長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更激化了民族主義，從而限制了中共政府在對日政策上的選擇空間，讓日本懷疑大陸民間究竟有無維持「中」日友好的誠意。¹⁴⁸北岡伸一則認為日本已負起戰爭責任，而且也已多次正式向中共謝罪，各家教科書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也沒有否認日本侵略歷史的意圖，只是認為細部的真相有待釐清，因此日本固然要對自己的歷史認識重新檢討，但中共更應重新檢視歷史資料才是。¹⁴⁹

整體看來，儘管日本仍存在著應在歷史問題上自省的呼聲，但「歷史問題是由中共挑起」的情緒正逐漸蔓延著。日本自認已經為當年的戰爭向中共付出許多，歷任首相也都發表過反省或道歉的談話（見表 2-5），但換來的只是中共一味的指責和中國大陸反日情緒的高漲，日方因而產生失望感和倦怠感。不但日本政府認為雙方都應擺脫「歷史的束縛」，構築面向未來的關係，而且認為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反日情緒的高張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教育所造成的，¹⁵⁰保守派更是認為中共的反日舉動已經危及日本的國家利益，因此對中共歷史觀的挑戰、認為首相應該參拜靖國神社的主張遂成為凸顯日本國家主體性、保衛日本國家利益的象徵了，甚至可以說，這些訴求正是針對中共而來的，是一種對中共試圖將「華夷秩序」擴及到日本的「干涉內政」行為進行反擊的思維。既然日本得了歷史倦怠症，強調日「中」關係「面向未來」的一面，那麼以利益至

¹⁴⁷ 猪口孝，前引書，頁 249。

¹⁴⁸ 古森利貞，「新しい日中関係の構築に向けて」，**中国 21**（名古屋），総第 10 号（2001 年 1 月），頁 190~191。

¹⁴⁹ 北岡伸一，「安保理改革と中国問題 いわれなき日本批判を排す」，**中央公論**（東京），第 120 卷第 6 号（2005 年 6 月），頁 56、58~63。

¹⁵⁰ 「21 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新たな時代，新たなビジョン，新たな外交—」，**首相官邸**，2002 年 11 月 28 日，頁 11，<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pdf>。

表 2-5 日本歷任首相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談話節錄（1989-2005）

首相	發言日期	發言場合	發言內容
竹下登	1989.2.27	眾議院預算委員會	我國在過去透過戰爭對鄰近各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害是事實，而關於我國過去的行為，其侵略事實不容否定。
宇野宗佑	1989.6.7	眾議院本會議	我國與中國在過去曾有過戰爭關係。對過去充分反省、透過戰爭帶給中國人民極大麻煩一事，對此也已在日「中」友好和平條約中表明。
海部俊樹	1990.5.14	參議院預算委員會	痛感對於過去日本國透過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害的責任並深切反省…我對這一態度並無絲毫改變之意。
	1990.5.21	參議院預算委員會	坦白說，我是承認（太平洋戰爭）侵略事實的。
宮澤喜一	1991.11.12	眾議院本會議	同竹下登發言
細川護熙	1993.8.23	眾議院本會議	過去我國的侵略行為和殖民地統治為許多人帶來了難以忍受的苦痛，在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和抱歉的心情。
羽田孜	1994.6.13	參議院預算委員會	日本入侵中國或者大陸一事的确是侵略行為。
村山富市	1995.8.15	戰後 50 年終戰紀念日談話	我國在不久前的過去一段時期因為國策的錯誤而走上戰爭道路，令國民深陷於存亡危機，並且因殖民地統治和侵略對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的人民造成了龐大的損害與苦痛。我……在此再次表示沈痛反省，並由衷表達道歉之意。
橋本龍太郎	1996.1.26	參議院本會議	我國在過去的一段時期因殖民地統治和侵略而對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與苦痛，對這一事實將虛心接受，並對此深切反省，對世界和平和繁榮貢獻心力。
	1998.3.25	參議院預算委員會	無法否認對中國採取侵略行動之事實。
小淵惠三	1999.4.28	參議院本會議	1995 年內閣總理大臣談話為政府立場之基礎。
森喜朗	2000.5.22	眾議院決算行政監視委員會	自日「中」共同聲明及總理談話之後，政府的認識沒有絲毫改變……我對這段不幸的歷史將有所反省，並明確認為當時的戰爭是侵略戰爭。
小泉純一郎	2005.4.22	亞非高峰會議	我國因殖民地統治和侵略對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的人民造成了龐大的損害與苦痛。對這一歷史事實將虛心接受，並將深切反省及由衷道歉的心情時常銘記於心。
	2005.8.15	終戰 60 年談話	

資料來源：整理自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国会會議錄檢査システム，<http://kokkai.ndl.go.jp/>。

註：自橋本龍太郎之後，歷屆內閣皆宣稱以 1995 年村山談話為政府正式立場。

上的思維主導著今後的日本對「中」政策也就可以預見了。

參、日本民間對「中」觀感的惡化

不只政界和學界對中共的認知日漸惡化，民間的對「中」感情也逐漸走下坡，這尤其反映在日本內閣府每年所舉辦的「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見圖 2-2）之中。在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簽訂之後的十年間，對中國大陸有親近感的日本民眾總在六成以上，沒有親近感的僅四分之一左右；然而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兩者的差距大幅拉近至 51.6% 和 43.1%。1992 年天皇夫婦訪問中國大陸雖然一度改善了日本民眾的觀感，但其後則呈現出高低起伏、整體走下坡的趨勢，例如 1995 年中共進行核試爆後，正反兩方的意見首度打平，而次年的台海軍事演習更導致對中共沒有親近感的比例首度超越有親近感的比例；其後日本民眾的觀感雖因「中」日高層互訪、企圖修復雙邊關係而略微改善，但小泉執政之後又開始惡化。2004 年後，受到亞洲盃足球賽引發的大陸反日風潮和攻擊日本駐「中」公使事件，以及 2005 年 4 月中國大陸各大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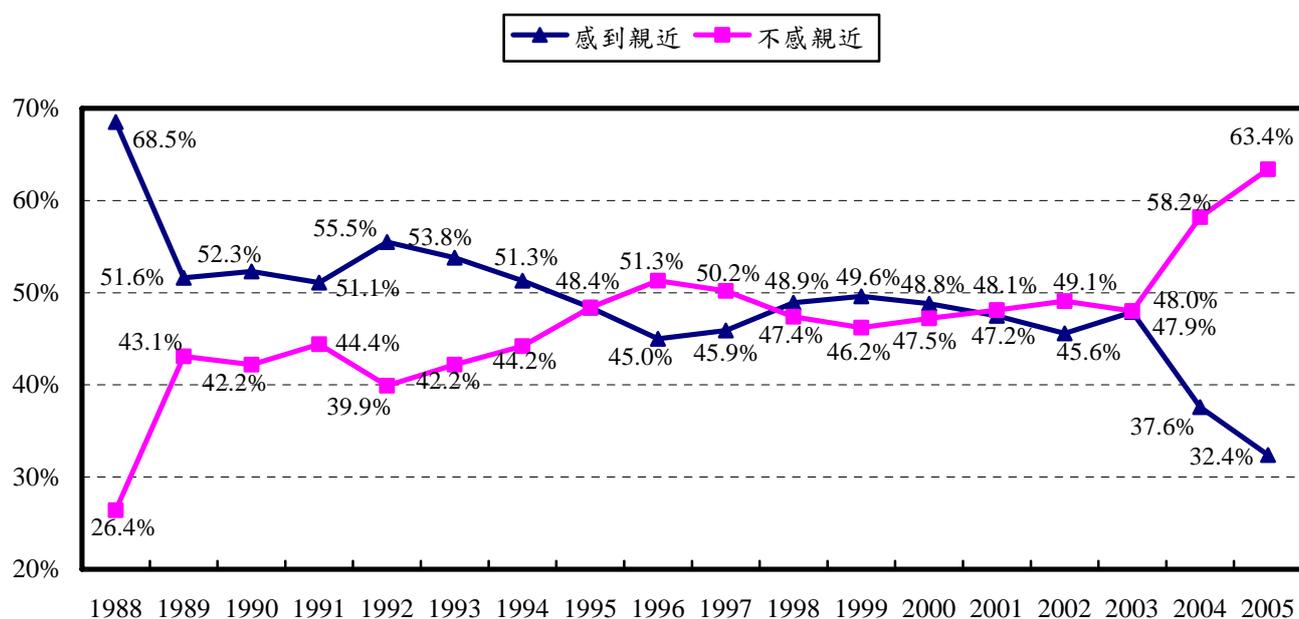


圖 2-2 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外務省（1988-2005）

資料來源：「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2005 年 10 月，
<http://www8.cao.go.jp/survey/h17/h17-gaikou/index.html>。

爆發反日示威的影響，對「中」抱有親近感的民眾比例已跌破四成，反之對「中」不感親近的比例則高達六成。

上一節所提到的「中」日共同調查也顯示出相近的結果。相較於中國大陸民眾在 1995 年之前對「中」日關係的樂觀態度，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和對未來日「中」關係的預期已經因為「六·四」的影響而先一步惡化，¹⁵¹而之後的發展更是幾乎呈現出喜歡比例直線下降、討厭比例直線上升的趨勢（見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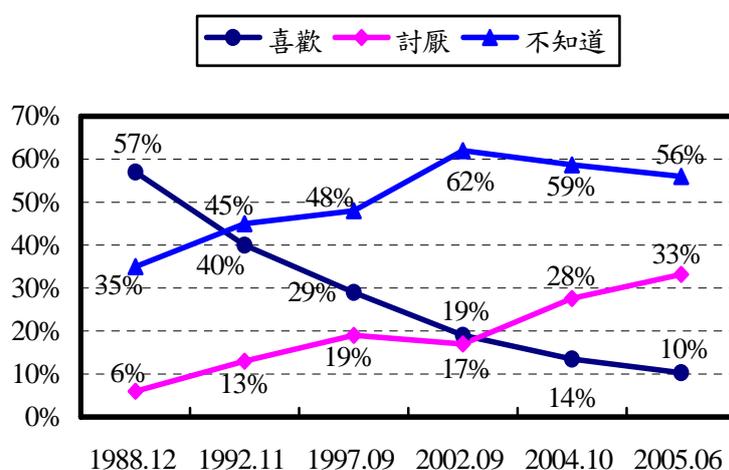


圖 2-3 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中」日共同調查（1988-2005）

資料來源：同圖 2-1。

在歷史認識方面，日本民眾也呈現出與中國大陸民眾極大的差異。1997 年和 2002 年的兩次調查顯示，日本民眾認為歷史認識問題是「中」日之間主要問題的僅有 34%（2002 年），認為日本在歷史問題補償上做得不夠的從 1997 年的 58% 降至 2002 年的 44%，認為做得夠多的則從 26% 遽增至 42%；在「日本面對歷史問題首先最應做出什麼努力」的問題上，認為日本首應衷心謝罪的從 17% 減少至 13%，認為日本首應充實歷史教育的維持在 13% 左右，絕大部分則是主張不論過去、創造新的合作關係（61%→67%）。在 2005 年的調查中，不僅最多的中國大陸民眾認為歷史問題的相互理解是改善「中」日

¹⁵¹ 真鍋一史，「第 13 章 日中關係と世論」，增田弘、波多野澄雄編，*アジアの中の日本と中国*（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 年），頁 294~297。

關係的首要工作，就連日本民眾也是如此（54.4%），然而和上述資料比對後可以發現，這一結果很難解釋成日本同意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呼籲，反而應該解釋成日本也開始在歷史觀上堅定自己的立場，並要求中共予以理解才較為恰當。例如 2005 年 5 月朝日新聞的民調即顯示，儘管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比贊成為多（49% 和 39%），但對中共在靖國問題的立場居然有 51% 表示無法理解，特別是自民、民主和公明三大政黨的支持者都有過半數認為如此。¹⁵²而在「言論 NPO」的調查中，雖然有 51.4% 和 44.6% 的民眾認為靖國神社參拜和日本歷史教科書是歷史問題中最待解決的問題，但認為問題在中國大陸教育、教科書的則高達 49%，另外認為問題在大陸媒體和中共政治人物對日發言的亦有 37.5% 和 32.3%。¹⁵³

不過，和大陸民眾相似的是，日本民眾日益升高的反「中」情緒尚未使他們視中共為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脅。從「中」日共同調查的數字來看，日本民眾普遍認為北韓才是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脅，甚至連認為美國有威脅性的比例都高於中共，顯見日本民眾鮮少認為中共是日本的安全威脅（詳見表 2-6）。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對中國大陸民眾感到有軍事威脅的第二順位是日本一事認為「從日本戰後一貫遵守和平憲法的立場來看難以理解」，而六十歲以上的受訪者認為中共是日本軍事威脅的比例也較六十歲以下的人為高。¹⁵⁴這些人是經歷過日中戰爭的，也應該是過去致力於日「中」友好的主力，因此應該是

表 2-6 日本民眾感到有軍事威脅的國家（1997-2005）

	美國	俄羅斯	中共	南韓	北韓	印度	其他	沒有
1997	19%	7%	18%	2%	29%	0%	0%	13%
2002	21%	4%	11%	1%	44%	0%	4%	3%
2005	10.8%	0.7%	8.1%	0.7%	64.6%	0%	5%	9.3%

資料來源：整理自「朝日新聞社・中国社会科学院 共同世論調査」；「『日中關係についての国際比較世論調査』の結果（詳細版）」，頁 8。

¹⁵² 「本社世論調査 靖国参拝『首相は中止を』49% 中国の問題視『理解できぬ』51%」，朝日新聞（東京），2005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

¹⁵³ 「日中共同世論調査—日本編」，言論 NPO，2005 年 8 月 30 日，http://www.genron-npo.net/about_history/000897.html。

¹⁵⁴ 「『日中關係についての国際比較世論調査』の結果（詳細版）」，頁 8。

對歷史問題感受最深的，如今他們的態度出現了這樣的轉變，似乎也說明了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嚴正立場並未得到具體效果。

肆、日「中」合作的瓶頸：「面向未來」重於「以史為鑑」

日本和中國大陸之間擁有地理與歷史上的密切關係，因此日「中」關係對日本而言不僅是「外交」，更是「鄰交」，是必須進一步讓國民瞭解其語言文化的深層關係；¹⁵⁵在外交上，日本將日「中」關係視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並指出深化日「中」相互依存關係、構築安定的友好合作關係對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是極為重要的，雙方不僅要追求共同利益，更要為了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繁榮合作發展「面向未來」、「共享利益型」的日「中」關係。¹⁵⁶因此，改善日「中」關係不僅有助於日本提升在亞太、甚至全球的政治影響力，同時也有助於緩和來自近鄰的安全威脅。

然而，日「中」兩國既存的利益衝突並未解決，而雙方在捍衛本國利益的出發點上又因歷史觀的不同而出現歧異，例如在台灣問題上，日本認為台灣近三十年來歷經了放棄反攻大陸政策、完成民主化成就及加入 APEC 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場合等轉變，日台關係自然會產生一定的變化，日本理應設法強化日台實質關係；而在中共的立場上，日本除了要求中共重視台灣民意，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之外，也認為中共有時對日台關係的主張過於僵化，反而給日「中」關係造成極大損失。¹⁵⁷在尖閣諸島問題上，日本則一改過去默認中共關於擱置釣魚台主權的立場，屢次重申尖閣諸島是日本領土，日本並未擱置主權，也不存在著領土爭議。¹⁵⁸如今日本對「中」的態度日趨強硬，民間也

¹⁵⁵ 21 世紀日本の構想懇談会，「21 世紀日本の構想 日本のフロンティアは日本の中にある－自立と協治で築く新世紀－」，首相官邸，2000 年 1 月，頁 30，<http://www.kantei.go.jp/jp/21century/houkokusyo/1s.pdf>。

¹⁵⁶ 外務省編，外交青書第 47 号（平成 16 年版）（東京：ぎょうせい，2004 年），頁 48。

¹⁵⁷ 「21 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頁 11~12、33。

¹⁵⁸ 「第百四十五回国会 参議院外交・防衛委員会会議録第二十一号」，国会議事録検索システム，1999 年 8 月 6 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45/0005/14508060005021a.html>。

開始認為日「中」關係不佳的責任在中共，¹⁵⁹這和中共反日情緒的高漲形成了相互刺激，倘若雙方政府無法緩和內部的不滿情緒，互不諒解的情形將更加嚴重，甚至從根本上破壞雙邊關係的安定性。

第四節 「中」日相互間錯誤認知的形成

中共與日本一開始就是在敵對的狀態下進行往來，而造成敵對的問題迄今也尚未解決，並在冷戰結束後進一步升溫。觀諸近年來的發展，中共與日本的相互認知已經出現了下列幾點問題：

1. 認知集中化—例如在歷史問題上，中共指責日本近年來在歷史問題的態度上有所倒退，企圖為過去的侵略歷史美化翻案，而日本則認為中共屢屢以歷史問題為藉口向其施壓，讓許多對「中」友好的日本人感到失望，保守派也以此作為要求對「中」政策強硬化的藉口；在安全問題上，中共一如建交前不斷指責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甚至認為日本在美日圍堵中共的態度上是更為積極的，¹⁶⁰而日本則對中共軍力的成長大感憂心，甚至引發「中國威脅論」，同時也認為中國大陸的反日運動是中共刻意挑起的。

2. 高估自身影響的重要性—過去在冷戰時期，一旦日本對「中」政策較偏向中共期待時，中共就會認為這是「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結果，但如今這種局面已不復存在，反而是雙方都不認為關係惡化的責任在己方，例如中共認為「中」日關係的倒退係由於日本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所致，而日本則認為是因中共對內進行反日愛國教育所導致。

3. 願望與恐懼對認知的影響—中共希望看到的是一個徹底反省歷史、發展方向符合中共預期的日本，而日本所希望的，是一個現代化、民主化，同時有

¹⁵⁹ 據 2005 年「言論 NPO」調查顯示，相對於中國大陸民眾幾乎把這一責任歸咎給日本，日本民眾也有較高的比例認為中共該負起責任。見「日中共同世論調查—日本編」，前引文。

¹⁶⁰ 「美日聯手對付中國—留美學者談中美日關係」，**環球時報**（北京），2005 年 3 月 25 日，第 15 版。

助於日本提升大國地位的中國大陸。然而，由於中共擔心日本國力的提升會與軍國主義思潮結合，日本則擔心中共強大後可能恢復「華夷秩序」，將影響力伸及日本，所以彼此都不免對另一邊在政治、軍事上的動作做出負面解讀。

4. 認知不一致——中共始終認為在歷史問題上日本沒有徹底反省，日本則認為其過去並非只有罪惡的一面，有過去先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日本。為了堅持自身的作法是對的，雙方都做出了進一步相互刺激的行為。例如中共對於反日示威中的破壞行為和吳儀突然離開日本的舉動都聲稱原因在於日本政府不肯正視歷史，反要日方道歉，民間也以「愛國無罪」來正當化其破壞行為；而日本政要則是一再參拜靖國神社，並以戰後日本已成為和平國家、參拜靖國神社是要向「英靈」致謝以及警惕今後不再發動戰爭，絕非要給戰犯脫罪為藉口。¹⁶¹

事實上這些認知都存在著誤解和偏見。中共和日本學者都認為所謂日本的「對中大戰略」和中共的反日立場是鐵板一塊的說法是有問題的，日本不見得有這麼完整的對「中」戰略，而中共權力核心未必是團結一致，而官方的對日批判和「反日」、乃至於一般民眾的對日感情也是有區別的。¹⁶²另外，隨著雙方內外情勢的變化，過去用以處理「中」日關係的手法勢必得做出調整。中國大陸就有「對日新思維」的呼聲，主張將歷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間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¹⁶³日本也有人反對「反中基本教義」，認為如此只會引起中國大陸反彈，弱化提倡「對日新思維」人士的立場，甚至讓日本在國際上陷於孤立。¹⁶⁴然而就目前的民意看來，雙方政府都陷入了不退讓不行，但也

¹⁶¹ 町村信孝，「对中国『へりうだり外交』を排す」，*文藝春秋*（東京），第 83 卷第 9 号（2005 年 7 月），頁 166~167。

¹⁶² 五百旗頭真、国分良成、谷野作太郎、丹藤佳紀，「日中の溝は埋まるのか—新時代における関係の再構築に向けて」，*外交フォーラム*（東京），総第 204 号（2005 年 7 月），頁 17；楊伯江，「中国対日認識の変化」，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はどう構築するか*（東京：岩波書店，2004 年），頁 64。

¹⁶³ 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北京），總第 57 期（2003 年 4 月），頁 73。

¹⁶⁴ 五百旗頭真，「反中“原理主義”は有害無益である」，*中央公論*（東京），第 119 卷第 5 号（2004 年 5 月），頁 87。

退讓不得的兩難境地。日本將歷史問題內政化的作法不但無法說服中共，反而令中共更加不滿；中共則是一如既往，拉攏歷史觀與中共接近的日本人士，在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同時以「我們瞭解日本的生死觀」來安撫供奉在靖國神社的一般戰死者家屬，力圖在不和諧中挽回「中」日關係，但其將歷史問題國際化的作法仍不免引起日本「干涉內政」的指責。這種兩難在「中」日關係上不只出現在歷史問題方面，也出現在從歷史問題延伸而來的領土主權和安全等現實問題上。歷史問題不但是「中」日關係的難解之結，甚至有可能變成死結，不用剪刀剪開任一端（必有一方受到傷害）是無法解決的。